



官方微信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智库微信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丰富、客观的社会经济问题解读视野。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高效帮助国内学子、政府企事业单位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及专业培训，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旨在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致力于为经济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19年
1-3月

- ▶ 我院荣登中国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
- ▶ 《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正式发布
- ▶ 我院连续 4 年赴 AEA 招聘海外博士
- ▶ 我院和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 我院 2018 年多项工作荣获暨南大学表彰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11月，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年11月，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年1月，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合实施的“111计划”。同时，我院名列《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赵金华教授担任中心主任，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邓永恒教授，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111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由冯帅章教授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James Heckman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双方将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此外，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旨在依托研究院的海归师资、专业声誉，帮助国内学子、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或进行专业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A&M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我院连续4年赴AEA招聘海外博士·····	01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正式发布·····	02
	我院荣登中国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	06
	我院和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07
	我院与国信证券共建实习基地·····	09
	我院张思思、徐吉良晋升为长聘副教授·····	10
	我院2018年多项工作荣获暨南大学表彰·····	12
02	科研动态	
	论文发表·····	14
	科研动态·····	16
03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19
	SEMINAR·····	29
04	思想聚焦	
	暨南论道·····	35
	IESR+·····	38
	乡村振兴政策简报·····	40
	观点评论·····	52
	媒体聚焦·····	74
05	数据调查	
	2019GMS：石牌印象：独特的市井天地·····	80
06	人物专访	
	IESR专访·····	83
07	学生天地	
	下一站，IESR！——寒假冬宣招生纪实·····	87
	IESR开展2018-2019学年第三、四期朋辈分享会·····	89
08	对外交流	
	·····	92
09	图说	
	·····	97

学院要闻

我院连续4年赴AEA招聘海外博士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正式发布

我院荣登中国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

我院和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我院与国信证券共建实习基地

我院张思思、徐吉良晋升为长聘副教授

我院2018年多项工作荣获暨南大学表彰

我院连续4年赴AEA招聘海外博士



冯帅章院长在招待会上讲话

2019年1月4日-7日，我院冯帅章院长、张思思副院长、谷一桢副院长一行8人赴亚特兰大参加2019年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年会（ASSA Annual Meeting 2019）开展海外招聘，这是我院连续4年通过美国人才市场招贤纳士。活动期间，我院为面试者举办了招待会，会上人口经济权威期刊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主编、全球劳动组织（GLO, 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主席 Klaus F. Zimmermann 教授颁发了2019年度 Kuznets Prize 最佳论文奖。



Klaus F. Zimmermann教授为最佳论文奖颁奖

此次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海外招聘工作主要面向计量经济学、产业组织和国际贸易、应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领域的博士毕业生展开，收到了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顶级名校博士的近300份申请材料。我院特聘教授——杜克大学经济系教授徐熠、哈佛大学助理教授白洁、乔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姚文雄与我院教师组成了专业教师招聘组。通过严格筛选，招聘组按学科领域分3个平行会场面试了118位应聘者。应聘者的专业涵盖了劳动、卫生与教育、环境、城市、区域、房地产、宏观、公司金融、计量、产业组织、贸易等经济学各领域。通过AEA招聘，我院向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经济学博士介绍了研究院的最新发展情况，同时接触了优秀人才，扩大了学院影响力。



面试现场

《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 正式发布



与会人员合影

2019年1月10日,《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发布会暨村长圆桌论坛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会议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作为点评专家,来自广州、清远、云浮的6位村委会代表受邀共同参与讨论。

会议开始,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介绍了广东千村调查,该调查于2018年5月-9月间进行,涵盖广东省约100个行政村、200个自然村的3000多户农户。千村调查从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脱贫、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整个调查获得了基层各村委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会上,冯帅章院长为“广东千村调查先进单位”的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接着,研究院各位参与调查的研究人员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包括村庄概况与生态环境问题、乡村就业与收支问题、乡村治理问题、精准扶贫与一村一品、乡村教育问题、农村金融问题六个方面。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冯帅章院长为“广东千村调查先进单位”
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01村庄概括与生态环境

在村庄概括与生态环境问题上,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李承政发现: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及健身设施普及率不高,有待进一步改善;珠三角地区土地流转率最高,但租金价格却远低于东翼和西翼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揭阳、湛江和河源等地村庄的水土流失问题比较突出;家庭饮用水以自来水为主,但是每个区域都有特色,例如山区居民偏好饮用山泉水,西翼地区则是更多地选择井水。农业发达的粤西地区,化肥施用和农业用药量最高;广东农村对秸秆的处理基本上都是以焚烧为主,秸秆科学还田的比例很低。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李承政

02乡村就业与收支

在乡村就业与收支问题方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卢晶亮发现:广东农村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为59%,就业人员中受雇劳动者占52%。全年外出务工者的主要特征是已婚比例低,较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在省内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务工,山区劳动者在本地就近务工的比例非常低。从全省家庭收支情况来看,农户主要收入的来源依次是工资性收入、外出人员寄回来的收入、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业经营收入。消费最主要的构成依次是食品消费、医疗保健支出消费和教育支出的消费。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卢晶亮

03乡村治理

在乡村治理问题方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李书娟发现:从基层的行政组织人员情况来看,广东省农村村委平均规模16人,正式工作人员8人,临时人员3人,大学生村官2人,社工3人。从非正式制度来看,广东的宗族组织非常发达,平均71%的行政村有祠堂,潮汕地区尤为明显,平均93%的行政村有祠堂。从第一大姓来看,广东省行政村第一大姓的人口占比平均约为50%,潮汕地区这一比例尤其高,第一大姓人口占比为70%。另外老人会在广东农村地区也普遍存在。从治理方式来看,约70%重大的集体决策、决定由村民大会投票决定,村民大会主要商讨公共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对贫困家庭的关爱。报告也建议在充分利用传统宗族文化服务乡村治理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强大的宗族势力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李书娟

04精准扶贫

在精准扶贫方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牛梦琦的报告主要针对精准扶贫户选择的准确性，扶贫资金使用合理性以及扶贫工程是否得到了真正的推广三方面展开。报告发现精准扶贫户的选择注重“家庭收入”和“劳动能力”、“家庭负担”并重，农户社会关系对是否认定为精准扶贫户没有显著影响。珠三角地区精准扶贫户收到扶贫款的比例是最高的，但是金额最低。相比起村民未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村民收到扶贫款的村收到各级扶贫资金的概率更高，行政村灵活使用扶贫资金的比例更低。扶贫八大工程中，村民参与社会保障扶贫和产业扶贫工程的比例最高。村民收到扶贫款主要是用于生活消费、看病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牛梦琦

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也有部分用于农业生产，极少存入银行或者投入收益性项目。

05乡村教育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韩昱洁

在乡村教育方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韩昱洁的报告发现：广东农村的义务教育参与和完成的情况

基本达到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广东农村小学入学情况和在学情况都比较良好，小学毛入学率与全国水平接近，且小学年龄阶段儿童的在学率高达99.5%。广东农村初中毛入学率稍低于全国的情况，在学率只有95%。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42.5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8.52%。90%的行政村有小学，仅12%的村有初中。村中无小学或初中增加了儿童的教育费用1000元左右，且主要增加的是与教育相关的生活费用。报告建议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尤其是初中教育的控辍保学以及促进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同时在撤点并校后充分考量后续配套建设。

06农村信贷

在农村信贷方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马祥的报告发现：广东的农村金融很不发达。只有不到3%的调查对象最近五年内曾从正规金融机构借入款；不到1%的调查对象最近五年内曾从非正规金融机构借入款。40%左右的家庭最近五年内曾从其他个人那里借过钱，这其中60%左右的借贷存在于近亲之间。借款大部分是通过口头约定的，通过正规合同约定的很少。总体来说，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生率都很低，主要的借贷集中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具有互助性质的、无利息的、口头约定的、没有具体还款日期的借贷。个人之间借贷主要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生活水平。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马祥

专家点评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进行了点评，他们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理解农户的行为是探索“三农”问题的关键，广东千村调查对乡村振兴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以及全面的治理视野。广东作为发达地区，不同的区域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调查所得数据的应用不仅对广东的决策有意义的，对全国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圆桌论坛



圆桌论坛现场

下午的圆桌论坛上，来自广州、清远、云浮的6位村委会代表与专家学者共议乡村振兴之道。各位代表首先概述了各自村的概况，包括人口、农业发展特色等，接下来，与会专家学者与各位村代表进行了深入访谈，内容包括土地流转、垃圾焚烧、扶贫金的使用等方面。圆桌论坛加强了学术研究与农村实际情况的有机结合。

我院荣登中国社会类智库 专业影响力排行榜前十

2018年 排名	智库名称	2017年 排名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	1
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2
3	新华社舆情研究中心	3
4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4
5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	5
6	中国（海南）改个发展研究院	6
7	上海大学基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7
8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8
9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	9
10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 究院政策研究中心	10

近日，首开中国智库排名先河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这是该中心自2014年起连续五年发布该报告。报告共分综合影响力排名、分项影响力排名、系统影响力排名、专业影响力排名、研究议题影响力排名、系统智库最佳项目（活动）提名、新智库提名（2015年7月1日以后成立）七个方面。其中，在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中，我院政策研究中心名列第十位。

《2018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聚焦“改革开放40周年与智库高质量发展”主题，立足中国智库发展现状，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创新与转型发展对智库建设的实际需求，力图对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项目组通过调查问卷，获取被访者对中国现有智库的主观评价信息，并运用问卷信息处理程序，计算加权得分获得中国智库综合排名与各类别排名结果。

我院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伊始就致力于打造以严谨深入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立足本土放眼国际，独立专业的新型智库。中心关注劳动就业、儿童发展、

人口流动、城市规划、住房政策、医疗养老、环境治理等多领域社会民生重大问题。基于微观数据形成政策性报告解读，定期举办政策研讨会，与国家及广东省有关政策机构展开合作，并与多家国际知名智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中心的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为公众提供专业、丰富、客观的社会经济问题解读视野。2017年12月中心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核心智库榜单，成为全国16家“高校智库A类——211高校经济领域”的入选智库之一。

中心成立至今，已先后在新华社、财经杂志、财新周刊、华尔街日报、FT中文网、澎湃新闻、南方日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等各大公众媒体上发表文章或接受媒体采访次数累计近40次。同时，以每周一篇的频率在政策研究中心的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上发表原创文章，累计82篇。此外，中心发布了7期政策简报，内容聚焦劳动力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租购同权”、乡村振兴等重要社会议题，并于近期发布《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村户基本特征、农村就业与收支状况、乡村生态状况及环境污染现状、乡村治理的现状、乡村教育现状、农村家庭金融行为、现有扶贫政策及实施效果。除此之外，中心还举办了7场政策性会议、40场政策类公开讲座，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民政部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百余人前来中心进行交流访问。

此次名列《2018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是对中心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与学术影响力的巨大肯定。未来，中心必将秉持初心，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我院和社科院人口与 劳动经济研究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合影

2019年3月4日上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IESR”）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人口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出席签约仪式的嘉宾有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人口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钱伟，办公室主任张彦海，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林宝，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高文书，研究员吴要武，IESR院长冯帅章，副院长谷一桢、张思思及IESR全体师生。

签约仪式首先由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致辞，宋献中首先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暨大商科历史已有百年，在新的百年起点，暨大商科要更多、更好地融入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当中去，要做出更多能够达到国际水准的研究。IESR成立以来做了很多工作，为暨大的经济学科添砖加瓦。此次与人口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是一个推动暨大经济学科发展，推动IESR把“顶天立地”的研究做到更好的重要举措。最后，宋献中希望此次合作能发挥双方的优势，创新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并祝愿合作硕果累累。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

接下来，IESR院长冯帅章发表致辞。冯帅章表示人口所历史积淀非常深厚，成立40年以来，在人口学劳动经济学、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都代表了国内一流水平。IESR对于能够与人口所展开高水平、全方位的合作感到十分荣幸。冯帅章表示双方将以目前的研究团队和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展开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合作包括但是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基于双方现有数据库资源的开发应用。双方将以人口所家庭动态社会

调查, IESR 中国家庭就业调查等为切入点, 合作撰写相关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彼此开放这些数据。第二, 积极开展新的合作调查项目。人口所有长期的、丰富的社会调查经验。而 IESR 下属的社会调查中心有自主开发的计算机辅助调查系统, 也有一个专业的社会调查团队。双方可以基于需要, 合作开展新的数据调查项目。来服务各自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第三, 进行学术与人才培养的常态化交流。第四, 在智库建设与政策研究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最后, 冯帅章认为在双方真诚有效的努力之下, 合作定能够进行得非常顺利, 最终实现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IESR院长冯帅章

随后, 人口所党委书记钱伟进行致辞。钱伟首先从发展历史、人员构成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简要介绍了人口所的基本情况, 并表示虽然 IESR 成立时间不长, 但师资力量雄厚、研究力量强大、科研成果突出、管理机制先进。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建立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以 IESR 的研究团队和组织体系为基础, 依托人口所的数据资源和政策咨询项目, 开展人口与劳动经济学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合作, 共同进行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 共同培养和开发人才, 共同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战略合作一定能取得圆满成功。



人口所党委书记钱伟



签约仪式

最后, 在热烈的掌声中双方共同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书, 双方将秉持初心, 为达到既定的合作目标不懈努力。

签约仪式结束后, 人口所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高文书及研究员吴要武分别带来了题为“中国的新经济与新就业”与“教育是信号还是人力资本? 来自中国学制改革的证据”的公开讲座, 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统战部特约专家林宝则与暨大师生分享了政策研究经验。讲座现场气氛热烈, 师生纷纷表示受益良多。

我院与国信证券共建实习基地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国信证券实习基地揭牌

2019年1月10日下午3点,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国信证券实习基地签约仪式在我院顺利举行。出席仪式的嘉宾有国信证券广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谭燕华、国信证券总部技术交易团队投研主管徐睿、国信证券广州分公司办公室人力资源总监范艺琼、国信证券广州分公司衍生品类业务总监周锋、国信证券广州分公司首席投资顾问林雄建、国信证券广州分公司投资顾问朱智勇与我院副院长谷一桢、院长助理朱宏佳、助理教授李润梁、杨尚铭等。

签约仪式由我院副院长谷一桢主持。谷一桢首先对出席签约仪式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接下来他简要介绍了我院与国信证券的基本情况。谷一桢表示我院有一流师资, 学生培养采用全英授课、与国际经济学培养体系接轨的培养模式, 而国信证券是全国性大型综合类证券公司, 拥有齐全的证券业务牌照及领先行业的产品, 因此, 双方决定发挥各自独特的资源优势, 在程序化交易相关课程, 学生实习、实践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介绍结束后, 双方代表国信证券广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谭燕

华与我院副院长谷一桢在热烈的掌声中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在场嘉宾共同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国信证券实习基地揭牌并合影留念。

签约仪式圆满结束之后, 国信证券总部技术交易团队投研主管徐睿博士为师生带来了题为“程序化交易入门的公开课”讲座分享, 介绍了程序化交易基础知识、程序化交易概述、程序化交易的策略类型等内容。讲座内容深入浅出, 深受师生好评。



谭燕华副总经理（左）与谷一桢副院长（右）

我院张思思、徐吉良晋升为长聘副教授

经研究院职称晋升评审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评定、学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议通过，张思思、徐吉良被评为长聘副教授（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张思思与徐吉良是我院自成立以来的首批长聘副教授。2017年9月，我院成为暨南大学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单位，获得了职称评定、评聘的高度自主权。研究院对教师实行准聘长聘制，其中包含助理教授、副教授、长聘副教授、正教授四个职级。每年，符合条件的教师可以向研究院提出升职申请。初审合格后，申请材料将送交国内外同领域专家，进行同行评议。之后，由研究院教师及院外专家组成职称晋升评审委员会，综合考虑申请人各方面情况，形成推荐意见，交由学术委员会最终决定。



张思思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

兼任职务：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理事

工作经历

- 2019/1-至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
- 2016/9-2019/1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 2014/7-2016/8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 2013/10-2014/6
美国房利美(Fannie Mae) 经济师
- 2010/5-2013/10
美国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 副研究员
- 2009/7-2010/4
美国IMPAQ International副研究员

学术成果

曾先后在*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mograph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Housing Policy Debate* 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十余篇高质量文章。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智库课题及北大-林肯中心研究基金项目。

教育情况

- 2004/9-2009/8
美国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博士
- 2002/9-2004/5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硕士
- 1998/9-2002-6
武汉大学经济学本科

荣誉奖励

- 2017年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年会最佳论文奖一等奖
- 2016年上海金融业改革发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徐吉良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

研究领域：计量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工作经历

- 2019/1-至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长聘副教授
- 2016/9-2019/1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 2014/9-2016/8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教授
- 2013/8-2014/8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助理教授
- 2009/8-2013/7
国立中正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教育情况

- 2009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 2004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 1998年获得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数学硕士学位
- 1996年获得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数学学士学位

学术成果

先后在*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 Theory*, *Econometrics Journal*, *Economics Letters*, *Applied Economics*, *Empirical Economics* 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十余篇高质量文章。

我院蔡澍、卢晶亮晋升为副教授

经研究院职称晋升评审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评定，蔡澍、卢晶亮晋升为副教授。



蔡澍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卢晶亮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政策研究轨）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

我院 2018 年多项工作荣获暨南大学表彰

近日，暨南大学召开 2018 年度各项工作表彰大会，我院朱宏佳、林嘉瑜、唐飞燕、黎莉 4 位老师荣获 2018 年度个人表彰，武茜、徐梦瑶的新闻作品获文字类优秀新闻作品。



林嘉瑜（右一）接受表彰



唐飞燕（左六）接受表彰

具体奖项如下：

朱宏佳荣获“2018年度暨南大学优秀本科生班主任”表彰

林嘉瑜荣获“2018年度暨南大学优秀文科科研管理工作者”表彰

唐飞燕荣获“2018年度暨南大学国际及港澳台侨交流合作先进个人”表彰

黎莉荣获“2018年度暨南大学工会 活动积极分子”表彰

“诺奖大师Heckman引爆暨南学术热潮”（作者：武茜、徐梦瑶）获“2018年度暨南大学文字类优秀新闻作品”表彰

2018 年度，我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宣传等工作取得优异成绩。

科研成果方面，2018 年度我院老师共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29 篇，获批 2 项国家级项目及 4 项省部级课题。人才培养方面，我院积极举办短期课程、学生 workshop 等各项活动，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及学生经济学思维。同时我院顺利完成本科评估工作，优化教风学风。

国际交流方面，海外引智项目成果丰硕，我院“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111 计划”。

此外，我院共主办了 9 场国际研讨会及学术会议并邀请 50 余位来自海外及港澳台地区的高校学者举办高质量讲座，搭建了一个活跃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宣传工作方面，我院四大微信公众平台针对不同用户群体，发布精准有效的资讯内容，积极创造有价值的新闻作品，助力我院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品牌形象的塑造。新的一年，IESR 必将积极进取，不断努力，继续深化各项工作，力争取得新的突破。

科研动态

论文发表：

我院助理教授陈祎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我院助理教授李承政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Applied Econo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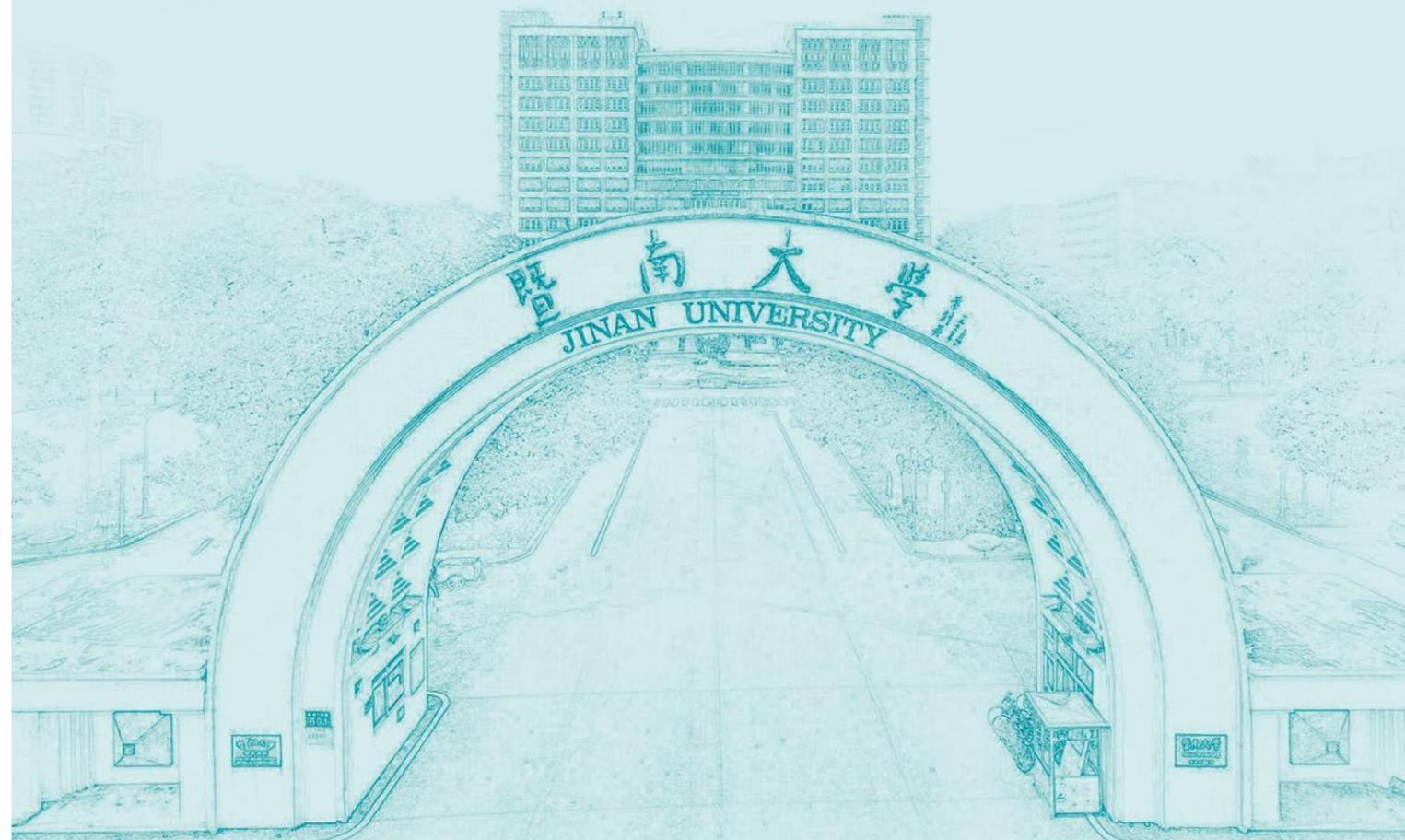
我院助理教授苏应俊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我院助理教授邱筠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我院助理教授谢斌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科研动态：

我院举办国家自科、社科项目申报经验交流会



论文发表

我院助理教授陈祎的合作论文发表于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近日, 我院助理教授陈祎的合作论文“Explaining the Decline of the U.S. Saving Rate: the Role of Health Expenditure”(合作者: Maurizio Mazzocco、Bela Szemely) 被国际顶级期刊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接受。*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是经济学科领域的国际权威期刊, 被认为是世界经济中最主要的期刊之一。该期刊创刊于 1960 年, 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大阪大学联合主办。其关注面非常广, 涵盖了经济学科的很多领域, 包括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学、以及应用经济学等。



助理教授 陈祎

我院助理教授李承政的合作论文发表于 国际知名期刊 *Applied Economics*

近日, 我院助理教授李承政的合作论文“Capital advantages: coul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ocated in Beijing city win mor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s?”(合作者: Yunyun Wang) 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Applied Economics*。



助理教授 李承政

我院助理教授苏应俊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近日, 我院助理教授苏应俊的合作论文“A Robust Approach to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Replication of the ACF Procedure”(合作者: Kim, Kyoo il, Yao Luo) 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助理教授 苏应俊

我院助理教授邱筠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近日, 我院助理教授邱筠的合作论文“Capitalization of interconnected activ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合作者 (Connolly, Cristina, Mitchell R. Livy, H. Allen Klaiberd) 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助理教授 邱筠

我院助理教授谢斌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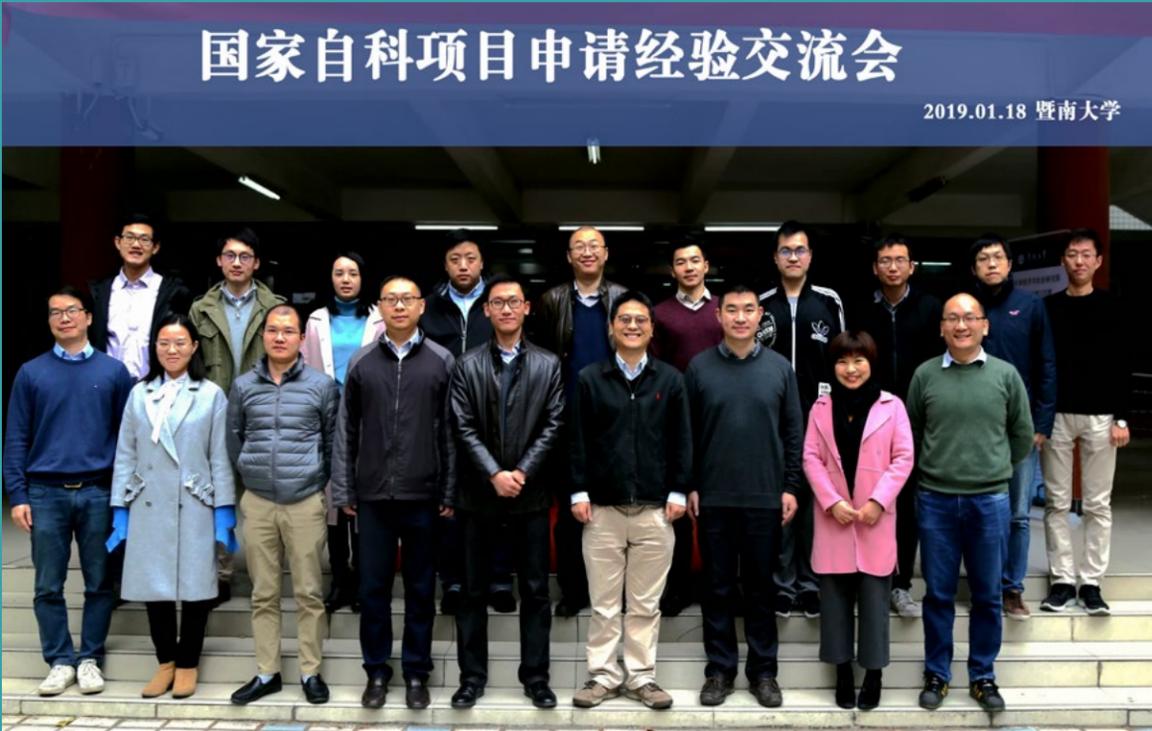
近日, 我院助理教授谢斌的合作论文“How Restricted is the Job Mobility of Skilled Temporary Work Visa Holders?”(合作者: Hunt, Jennifer) 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助理教授 谢斌

科研动态

我院举办国家自科、社科项目申报经验交流会



国家自科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
2019.01.18 暨南大学

2019年1月18日,我院召开了国家自科项目申请经验交流会,会议邀请了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财经大学4位有过多次自科项目申请成功经验的资深学者分享交流经验,并听取了我院多位年轻教师的申请计划,给出了宝贵意见。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与管理学院教授范子英分享自科申请经验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梁平汉分享自科申请经验



当天下午,我院又召开了国家社科项目申报交流会,会议邀请了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我院特聘研究员韩嘉玲、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杨杰、暨南大学财务处科研经费管理科科长乔龙珍分享交流社科项目申报经验和注意事项,并与我院诸位教师交流讨论。



暨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杨杰介绍了社科基金申报的要点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我院特聘研究嘉玲分享社科基金申报经验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SEMINAR

学术会议

IESR-GLO “一带一路” 劳动力市场研讨会



与会嘉宾合影

2019年3月21日-22日，我院与全球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主办的 IESR-GLO “一带一路”劳动力市场研讨会于暨南大学中惠楼106室顺利召开。这是我院第二次与GLO进行深度合作，本次会议邀请了国内外知名高校的学者进行了相关论文分享报告，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劳动力市场问题。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首先对与会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冯帅章表示这次的会议主题是“一带一路的劳动力市场”，但实际上涉及的话题十分广泛。本次研讨会邀请到了来自德国、意大利、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柬埔寨等国家的学者，目的在于丰富参会者的多样性。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大家可以加深对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理解，互相探讨、互相学习。

随后，GLO主席 Klaus F. Zimmermann 教授表示很高兴能再一次来到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研究院的发展非常迅速。“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全球化议题，得到了很多



Klaus F. Zimmermann教授

人的关注。自己当初创建GLO的目的，就是希望搭建一个全球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在今天，局部地区出现了反对全球化的声音，甚至出现了逆全球现象，作为学者应该捍卫全球化这一文明成果。“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关乎南亚地区或局部地区，更是全球国家间的关系建构，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可以增进对彼此的认识。



Miichele Bruni(University of Modena)分享了题为“China and the BRI Countries at a Demographic Crossroad: Labour Market Implic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的报告。



Asad Islam(Monash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Can Referral Improve Targeting? Evidence from a Training Experiment”的报告。



Jinseong Park(Jinan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Parental Wealth and Transition to Employment:Evidence from Housing Wealth Shocks in South Korea”的报告。



M Niaz Asadullah(University of Malaya)分享了题为“Female Seclusion from Paid Work: A Social Norm or Cultural Preference?”的报告。



Shuaizhang Feng(Jinan University)分享了题为“The Challenge of Internal Migration on China’s Long Term Sustainable Growth”的报告。



Chandarany Ouch(Cambodia Development Resource Institute)分享了题为“China’s BRI an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ambodia’s Labour Market”的报告。



Sen Xue(Jinan Universtiy)分享了题为“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on Migration and Migrant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Response”的报告



Klaus F. Zimmermann(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分享了题为“Arsenic Contamination of Drinking Water in Bangladesh: Knowledge and Response”的报告。



会议现场



与会嘉宾热烈讨论

会议间隙,小编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问题采访了与会学者,他们对此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Q1您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何看法?

•Chandarany Ouch: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与方便的运输系统,使得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与交流变得更为通畅。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对于柬埔寨而言,其意义更为显著。

• M Niaz Asadulla:

在全球经济中心正从西方向亚洲转移的环境下,我们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其重要意义不仅对一个国家,更是对整个亚洲地区而言。这也是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巨大的空间可发挥作用,能真正带动本世纪整个亚洲的发展。

• Asad Islam: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各个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个政策对于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有显著作用。

• Michele Bruni: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这是一个奇妙的想法,也许是最具创新性的想法。目前“一带一路”更多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通讯设备建设,我认为缺少了人力资本传播。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传播教育,因为在劳动力充裕的国家中进行更多的职业培训,这样不仅仅能为当地提供充分的劳动力,其外部效应也会外溢至其他国家。

Q2 您是否注意到您的国家因为“一带一路”实施而产生了哪些改变？

• Chandarany Ouch:

“一带一路”实施以来,更多的中国投资来到了柬埔寨,带来了地价、房价的提升,有一些民众因此获益。

• M Niaz Asadullah:

“一带一路”创造了许多需要大量资源的公共产品,而这些是小国无法提供。这既是中国所具备的竞争优势,也是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的责任所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系,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它需要除国内市场以外的更大的市场。通过“一带一路”连接起来的亚洲经济体,也许将有一天能形成类似欧洲的统一亚洲市场,这将使得中亚国家真正受益。

• Asad Islam:

我认为孟加拉是非常具有潜力的,因为它离中国很近,通过陆地交通就可以互相连接。孟加拉需要基础设施投资。我们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需要提高陆地交通的连接,加入这个倡议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机遇。

• Michele Bruni:

它可能会对意大利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港口,对旅游、贸易等方面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教育上,中国仍然向澳大利亚和美国看齐,但我认为它应该更关注欧洲。我们的传统文明比美国与澳大利亚更丰富,中国应该更多地认可欧洲文明。

Q3 “一带一路”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何种影响？

• Chandarany Ouch:

中国的投资的确带来了更多就业机会,柬埔寨服装与纺织业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乡村地带的人们就业机会也为此增加,他们能进入城市的工厂工作。

• Asad Islam:

当我们的基础建设发展了,流动性才能提高。交通和其他的服务发展起来了,实际上也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尤其是女性及农村地区人口的劳动参与度,他们可以更多地参与到工业和服务业中。

Q4 您觉得“一带一路”倡议遇到了哪些挑战?您有何建议?

• Chandarany Ouch:

我认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在于其开展的项目并不明确,即使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也并不清楚“一带一路”具体的项目是什么。此外,我建议中国应该对援助资金的后续使用进行监控与评价,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腐败行为。

• M Niaz Asadullah:

我认为挑战在于中国并非亚洲唯一有雄心壮志的大型经济体,还有印度。中国和印度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差异,这会导致摩擦。这就是需要对话的地方,庆幸的是现在还有很多的对话空间。

• Asad Islam:

中国在连接并推动与各个国家的联系上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至于“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我认为是各个国家的政策利益及地缘政治利益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认为,最后各个国家都会加入这个倡议,因为这总体上是一个很好的倡议,不同意加入的国家最终会落伍。

第二届

“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



参会人员合影

2019年3月30日,第二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本次会议由《经济研究》编辑部、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以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共同主办。会议邀请了来自《经济研究》编辑部、西南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共报告了20篇基于各种微观经济数据库的原创性论文,探讨了与微观经济数据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相关问题。该论坛每年举办一届,首届论坛于去年在西南财经大学召开。

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他首先对参会嘉宾表示欢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感到非常荣幸。微观经济数据的建设是实证经济学研究最基础的工作,由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发起的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进行的一系列开创性数据都为实证经济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接着,他介绍了《经济研究》编辑部以及各高校嘉宾代表,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

包括:《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刘霞辉研究员,《经济研究》原常务副主编郑宏亮教授,《经济研究》杂志社张永山社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钱文荣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涂勤教授,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高霞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首席调查员马双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基层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丁副教授,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赵宁茹副教授。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 擦亮微观经济数据的金字招牌

首先，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致辞。他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表示，《经济研究》作为一本创刊于1955年，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期刊，被评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且是唯一入选的经济理论期刊，是很多从事经济与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的奋斗目标。近几年，《经济研究》编辑部与高校的联系尤其密切，为提升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做出了突出贡献。

接着，他介绍了此次会议的另一主办方——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2017年，为了推动我国经济领域微观基础性数据库的建设和完善，甘犁教授联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等9所单位成立了该平台，共同开展微观调查数据的收集、研究工作。如今，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推进与社会经济政策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

的科学制定越来越依赖于高质量、大规模的微观调查数据，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的创立迈出了当代经济学研究极具前瞻性的关键步伐，对于中国高校数据库的开放和共享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是暨南大学建设双一流大学和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契机下成立的新型科研和教学机构，成立3年多以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的建设，成立伊始就建立了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广东千村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生产力全要素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等大型的社会调查。2018年，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创新引智基地成功入选“111计划”基地，这是暨南大学首个社科类的“111计划”引智基地。在2017年的核心智库榜单中，经济研究院成为全国16家高校智库A类“211”高校经济领域的预选智库之一，在2018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中，研究院位列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前十。

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莅临暨南大学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学校的办学成绩，鼓励暨南大学继续擦亮金字招牌。宋献中表示，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建设就是暨南大学经济学科的一大特色，也是暨南大学的一块金字招牌，要把它擦得更亮，水平办得更高。他相信此次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将进一步推动微观数据在各个研究领域与政策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国家决策贡献智慧与力量。

《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未来中国经济的道路有赖于微观经济数据调查

接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教授致辞。他首先代表《经济研究》编辑部全体同仁感谢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为会议的举办付出的辛劳，也感谢参会者提供的论文使得会议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教授

他希望微观经济数据论坛能够办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论坛。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进入了非常敏感的发展时期，过去许多所谓成功的经验面临着重新去思考，重新用理论去武装的状态，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到底要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有赖于微观的经济主体尤其是个体、企业以及政府进行重新的梳理和理解，有赖于重新对政府、企业进行市场和管理的定位。而上述种种研究都需要更细致、更深入的社会调查，尤其是从现实的调查中来获取理论和实践的灵感，从而指导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实践。他坚信论坛如果能坚持现有的想法走下去，一定能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实践做出更多的贡献。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 国内学术杂志能更准确把握中国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最后致辞。他首先感谢暨南大学以及《经济研究》对高校数据收集工作的支持，是他们的支持让调查继续走下去充满了希望和干劲。

接着，他对“海归”引进对中国经济研究的影响发表了看法。近十几年来，大规模的“海归”引进对中国学术研究的规范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却也导致了对中国问题研究脱离了中国实际情况。目前的学术研究更注重国外杂志发表，但是海外杂志对中国问题以及什么是中国重要的问题把握不准确，虽然研究问题有趣，但是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真正面临的重要问题和困境。因此，应该把《经济研究》这样的国内顶尖杂志在学术评价体系当中的比重放大，这样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才会更加到位。同时，中国数据是基础，因此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对整个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

2 大主题演讲，4 大研究领域，20 篇前沿论文



冯帅章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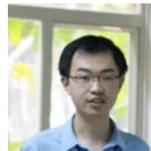
甘犁教授

在各位嘉宾致辞后，主题演讲和论文报告环节正式开始。首先，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作主题演讲，题目分别为：“一个激励相容的劳动奖励田野实验”和“高校扩招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影响”。

主题演讲后，学者们在“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劳动经济”、“家庭金融”、“经济发展”4大研究领域共分享报告了20篇前沿论文。

• 城市与房地产经济

王驹飞（复旦大学）报告了“为什么大城市居民的储蓄率更低？通勤成本与服务消费的视角”的论文



谷一楦（暨南大学）点评

杨超（江西财经大学）报告了题为“撤县设区如何影响土地价格——基于微观土地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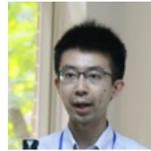
朱宏佳（暨南大学）点评

孙伟增（中央财经大学）报告了题为“租金上涨挤出了家庭消费吗？——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的论文



刘诗濠（暨南大学）点评

史伟（暨南大学）报告了题为“农户住宅产权和家庭创业决策”的论文



李琴（华南农业大学）点评

何春燕（西南财经大学）报告了题为“房价调控‘失灵’下的地方政府‘违背’行为——基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视角”的论文



马森（暨南大学）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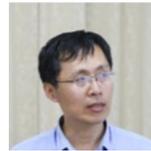
• 劳动经济

梁斌（内蒙古大学）报告了题为“失业保险如何影响求职努力？——来自‘中国时间利用调查’（2017）的证据”的论文



刘毓芸（中山大学）点评

宁光杰（山东大学）报告了题为“户籍制度、劳动力流动性与资本深化：当前我国企业机器替代劳动的另一种解释”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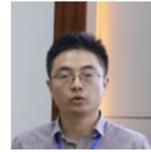
马祥（暨南大学）点评

程宇玮（中山大学）报告了题为“重点产业政策与人才需求——来自企业招聘的微观证据”的论文



谢斌（暨南大学）点评

张吉鹏（西南财经大学）报告了题为“户籍制度门槛与劳动力回流”



宋彦（暨南大学）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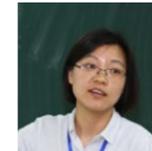
陈技伟（暨南大学）报告了题为“最低工资与性别工资差距”的论文



申广军（中山大学）点评

• 家庭金融

潘丽群（广州大学）报告了题为“财富冲击、商业保险购买与居民保险选择偏好”的论文



李润梁（暨南大学）点评

蒋佳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报告了题为“住房财富与劳动供给”的论文



杨哲（暨南大学）点评

陈秋月（南京农业大学）报告了题为“‘愚人自以慧，智者自以愚’——金融素养‘达克效应’与城镇家庭债务风险”的论文



郑筱婷（暨南大学）点评

林宏妹（上海财经大学）报告了题为“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的论文



郑贤（暨南大学）点评

张思思（暨南大学）报告了题为“住房财富变动与家庭资产选择”的论文



徐丽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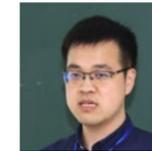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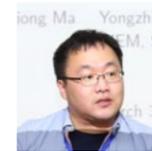
• 经济发展

薄诗雨（暨南大学）报告了题为“医闹将会让我们失去未来的医生吗？”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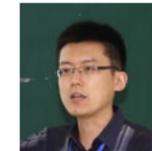
马双（广州大学）点评

孙永智（西南财经大学）报告了题为“Does the College Admission Policy Improve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s Poor Counties?”的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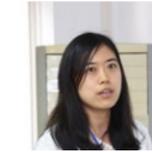
陈伟（暨南大学）点评

张力（中国人民大学）报告了题为“Moving to Opportunity, Labor Suppl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Evidence from a Relocation Program in China”的论文



薛森（暨南大学）点评

王逸飞（暨南大学）报告了题为“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工资与就业增长的影响——来自于中国主要城市的证据”的论文



李小白（中山大学）点评

周宇红（西南财经大学）报告了题为“社会资本、低保瞄准与多维贫困度量”的论文



张宇（南京审计大学）点评

•现场讨论锦集

此次论坛进一步推动中国高校数据库的开放和共享，促进各校专家学者进行交流，助力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得到与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SEMINAR

【第 125 期】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邓希炜：
Trade Linkages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

2019年1月17日下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邓希炜副教授应 IESR 的邀请，在中慧楼 106B 室作题为“Trade Linkages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US-China "Trade War"”的专题报告，部分研究院师生参加研讨。



邓希炜老师针对特朗普引发“贸易战”的结果和原因进行经济分析。追溯到 2018 年的 3 月 22 日，特朗普提议对高达 5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这极大引起了全世界对“中美贸易战”的关注。邓老师根据对中美贸易的直接和间接风险，评估两国公司对此事件的市场反应。对于大部分依赖在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的美国公司来说，它们的股票和债券收益率较低，但在股权和债务公告日期的短时间内，他们具有较高的违约风险。他还发现，通过国内投入产出的商务关联，部分企业间接接触到中美贸易也会影响他们对股权和债务公告的回应。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结构比全球贸易的简单化观点复杂得多，且后者引发了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

本次结合时事的专题报告使师生能更全面地了解中美贸易近况，并且为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师生开拓了新的学术视野。

【第 126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研究员：
教育是信号还是人力资本：来自
中国学制改革的证据

2019年3月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研究员进行了题为“教育是信号还是人力资本：来自中国学制改革的证据”的学术讲座。



吴要武介绍了从亚当斯密所提出得关于“分工”的著名论断引申出的两个理论学派：人力资本学派和信号理论学派，进而探讨在两个代理人具有相同信号（相同学历）的前提下，不同的受教育年限是否会导致不同的市场收入，即不同的人力资本是否在相同信号情况下起作用？

中国进行了多次具有地理差异性的学制改革，表现为长短学制“轮番上阵”，这导致同一学历的人群可能具有不同的受教育年限。吴要武发现，学制选择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级市层面，而不是城乡层面。因此，在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的条件下，学制变化对被调查的个体来说可以看做外生。通过使用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进行混合截面数据回归，吴要武发现，在每一个学历层次上，经历长学制的人群具有收入优势；在同等学历背景下，实际受教育年限越长的人群，其收入优势越大。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吴要武先根据不同学历、不同雇佣状态（自雇者与受雇者）划分子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然后对经验策略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分别检验了“市场有效性”、“教育收益率”、“学制改革的随机性”以及“信号理论的作用”，最后运用 CULS 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发现所得的分析结果均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

【第 127 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邢剑炜：
Cars or Trucks? The Impact of Attribute Basing in Fuel Economy Regulations

2019 年 3 月 4 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邢剑炜做客 IESR，分享了题为“Cars or Trucks? The Impact of Attribute Basing in Fuel Economy Regulations”的研究报告。



汽车分类是环境法规中的一种常见监管策略：为了减少产品的外部性维度，法规以一种次级特征来划分对不同车辆监管的严格程度。这项研究提供了关于美国企业平均燃料经济（CAFE）标准下的汽车分类的福利结果的经验证据。在 CAFE 的整个历史中，监管政策的严格程度基于一种离散性的分类：将机动车分类为乘用车或轻型卡车，其中对后者的管控力度不那么严格。这种对汽车和卡车的差异化处理具有负面影响，因为它可能会扭曲机动车的构成并增加尾气排放和与交通事故相关的外部性（因为轻型卡车的市场份额变大）。通过结合 CAFE 信用交易的数据来构建一个关于车辆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模型，这项研究模拟了一个移除掉汽车分类法规的反事实情景，发现车类分类导致轻型卡车销量增加 4.9% 和相应的社会福利损失为 28.3 亿美元（以 2014 年为基准计价）。汽车分类也导致汽车制造商之间的福利再分配：美国国内厂商受益于这一法规从而利润增长 1.8%；相应地，亚洲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的利润损失分别为 1.5% 和 4.0%。

【第 128 期】

上海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张同斌：
New Tests of Expectation Forma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Asset Pricing Models

2019 年 3 月 15 日，上海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张同斌做客我院第 128 期 Seminar，分享了题为“New Tests of Expectation Forma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Asset Pricing Models”的工作论文。



本文发展了关于期望构成的新的检验，这些检验通常使用于金融和宏观经济模型，并且利用了模型变量预测中的协整约束。调查数据表明：股票价格的预测与消费预测并不相关，并且在较大范围内的资产定价模型中，拒绝了股票价格预期的构成，此前提到的资产定价模型，指的是包括理性预期及各种基于学习或情绪模型。这篇文章表明，直接向主观的股票价格预测情绪（或判断）可以使股票定价模型与新的调查证据相协调。

【第 129 期】

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张鹏：
Does air pollution increase weight gain and obesity? Evidence from China

2019 年 3 月 15 日，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与金融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张鹏做客 IESR，分享了题为“Does air pollution increase weight gain and obesity? Evidence from China”的研究报告。



张鹏老师的这篇文章利用 1989-2011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 13,226 名成年人的健康和营养信息，首次研究空气污染与体重增加及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该文章旨在识别新的、导致肥胖的原因，并阐明空气污染的潜在成本。

他们发现利用逆温层 (thermal inversions) 作为工具变量衡量的空气污染对体重指数 (BMI) 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特别是过去的 12 个月，PM2.5 的平均浓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26.19 $\mu\text{g}/\text{m}^3$)，就会使 BMI 增加 0.55 个标准差；并且会使得超重 (BMI ≥ 25) 和肥胖 (BMI ≥ 30) 的概率分别增加 0.57 和 0.31 个标准差。

【第 130 期】

波士顿大学副教授 Hiroaki Kaido：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Projections of Partially Identified Parameters

2019 年 3 月 19 日下午，波士顿大学副教授 Hiroaki Kaido 做客我院 SEMINAR 第 130 期，他分享了题为“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Projections of Partially Identified Parameters”的报告。



矩不等式模型 (moment inequality models) 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微观经济学中，模型中结构参数的部分识别 (partial identification)，估计与检验已经有大量相关研究。Hiroaki Kaido 在文中提出如何对矩不等式模型中结构参数的某个特定维度，或者结构参数相关平滑函数构建检验参数所需要的置信区间。本方法是基于自抽样 (bootstrap-based) 的校准投影步骤来构建的，校准问题被转化为基于重复的观测线性规划 (linear programming) 的可行性问题，且转化后的计算既高效又简便。即使考虑一个相当大范围的数据生成过程，此方法依然可以控制置信区间对于结构参数的渐进覆盖概率。在转化校准问题的过程中，置信区间中存在的极限点可能是非线性的，甚至是更加错综的，考虑到这种极端情况，本文给出了基于反应曲面法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解上述优化问题的高效算法。文中也证明了此类算法的收敛速度。文中应用部分以微观经济学中离散范式博弈模型为例子，展示了此方法的实用性。蒙特卡洛模拟部分与其他相关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展示了本文置信区间的精准性与计算的简便性。

【第 131 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
住房持有成本、持有量与持有不平
等——来自中国取暖费的证据

2019年3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文凯作客 IESR 第 131 期 SEMINAR，分享了题为“住房持有成本、持有量与持有不平等——来自中国取暖费的证据”的研究报告。



孙文凯老师的文章关注物业费等住房持有成本对住房持有量的影响，创新性地从取暖成本这一角度观察持有成本对住房拥有数量及分布影响。

文章基于中国在淮南北不同的强制冬季供暖政策，利用地理位置的断点估计取暖费带来的额外持有成本对住房需求的影响。发现取暖费显著减少了北方居民住房持有的套数和面积，同时能够一定程度减小住房持有数量的不均等，且文章结果具有稳健型。该研究具有填补已有文献空白及政策指导意义。

【第 132 期】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鹏飞：
A Theory of Housing Demand Shocks

2019年3月25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鹏飞在我院分享了题为“A Theory of Housing Demand Shocks”的研究报告。



在宏观模型中，住房需求冲击是房价波动的重要来源，其通过抵押渠道使得宏观经济波动。然而，数据显示这些冲击并未导致与房价一同变动的售租比的过度偏离。

王鹏飞老师的这篇文章通过构建异质代理人模型为住房需求冲击提供了微观基础，旨在解释上述的“房价租金之谜”。该模型预测信贷供给冲击会在房价和售租比之间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相关实证证据也支持这一理论预测。

【第 133 期】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李冰晶：
Impor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2019年3月28日，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李冰晶作客 IESR，分享了题为“Import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的研究报告。



外国竞争是否能促进创新？Autor, Dorn, Hanson, Pisano 和 Shu (2017) 以及 Bloom, Draca 和 Van Reenen (2016) 这两篇文章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探索中国的创新与进口竞争(import competition)之间的联系，是李冰晶老师的文章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他们利用 2000-2007 年的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manufacturing firm survey data)与海关(customs data)和专利数据(patent data)进行研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使得进口壁垒得以削弱，与此同时我国的专利数量大幅上升。

李老师与其合作者发现，进口带来的竞争促进了创新，但这种影响仅限于最具生产力的企业(前 33% 的企业)。进口关税每降低一个百分点，这些公司的专利率就会提高 3.6-4%。无论使用行业范围(sector-wide)的产出关税还是以公司层面加权的关税衡量的进口竞争，得到的结果是相似的。在进口自由化后，顶级公司(top firms, 最具生产力的前 33% 的企业)的研发支出(R&D expenditures)与国内销量都增加，这与文章的主要结论一致。此外，他们还发现，面对更大的竞争，顶尖企业不仅会提高核心技术，还会扩大专利组合(patent portfolio)的范围。

这篇文章的实证研究与 Aghion et al. (2009) 利用模型得出的结论一致，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进口竞争会通过降低整个行业的利润来阻碍创新，但是接近技术前沿的公司会增加研发投入来避免竞争。

【第 134 期】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系
助理教授 Lin Tian：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ductivity
advantage of citi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Brazil

2019年3月29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Lin Tian 作客 IESR，分享了题为“Division of Labor and productivity advantage of citi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Brazil”的研究报告。



Lin Tian 首先提出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在大城市中的公司有更高的生产力。经济学界对此有许多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Lin Tian 的研究聚焦于由亚当·斯密率先提出的一种的解释：因为大城市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的分工程度，所以位于大城市的公司有更高的生产力。

在研究中，Lin Tian 使用了巴西国内的公司数据。研究首先证明了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后，劳动分工确实与城市规模紧密相关。为了量化分工在解释城市生产力优势中的重要性，Lin Tian 提出并估计了一个定量模型，该模型嵌入了企业在空间均衡框架中选择最优劳动分工的理论。在该模型中，企业劳动分工与城市规模之间的相关性是由选择效应和处理效应共同作用的。模型中的选择效应是指企业自身跨越空间排序，选择不同程度的劳动分工，处理效果是指大城市通过降低相关成本以提高劳动分工。

Lin Tian 使用了巴西逐步退出宽带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事件作为准实验，证实了模型的关键假设并对模型参数进行结构估计。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Lin Tian 最终估计出劳动分工占巴西大城市生产力优势的 15%，其中，一半是来自于整体排序，另一半来自于城市规模较大的处理效果。

问政暨南

第7期：中国的新经济与新就业

思想 聚焦

问政暨南

IESR+

乡村振兴政策简报

观点评论

媒体聚焦



高文书研究员

3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高文书研究员到访 IESR，并为师生分享了题为“中国的新经济与新就业”的讲座，这也是“问政暨南”第7期活动。高文书阐述了何为中国“新”经济、“新”就业环境以及新经济下的新就业环境面临的挑战。

何为“新”经济

新经济的“新”表现在由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主导进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我国的5G、共享经济等产业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梯队，由此，新经济环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高文书介绍，在中国，可以将新经济概括为“三新”，分别是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引用张车伟教授对新经济定义方面的贡献，可将新经济分为新技术经济和新业态经济，具体来说，新技术是

指技术上的创新，如5G；新业态是运用新的技术或运营方式将之前旧的行业改革，如网约车。新经济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占整个经济的GDP比重达20%以上，新经济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都给经济带来了新动能。

何为“新”就业

在没有劳动生产率突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会带动就业。根据测算，在新经济行业直接或间接工作的劳动力大约占就业人群的16%。新经济对就业岗位有创造作用，网店经营者、网约车司机、微商等个体私营劳动者比例在不断增加。由于新经济的比例不断上升，非标准就业比例随之快速增长，原有的雇员-雇主关系逐渐淡化，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法律法规能够覆盖的劳动者范围逐渐变小。新就业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工作时间灵活、劳动者价值更

好体现、工作模式变为“平台+个人”、数字技能要求更高。在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就业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就业极化是指，对技能分布两端的劳动力的需求在增加，中间的就业岗位在减少。工资方面也有极化表现，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工资增长率更高，中间部分的劳动者增长率更低。同样中国的极化效应在其他国家也都存在，但目前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法。

新经济下的新就业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是就业创造、转移、损毁和折算的问题。新经济环境下给就业环境带来的是就业创造还是就业转移？网购盛行，实体店的就业损毁如何识别？在工作时间灵活的环境下，如何进行就业折算？

其次是新经济下劳动关系如何认定。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依赖型自雇工作都没有标准的劳动合同，但这类工作甚至比劳动合同用工管控得更严，当遇到工伤等问题时，劳动者难以获得现有劳动保障体系的有效保护，这是目前比较大的挑战。

最后是新就业的社会保险问题。在中国以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社会保险体制都是针对标准就业的雇员，也就是必须有雇主、劳动合同，才能够参加社保。在新经济环境下，很多劳动者无法签订劳动合同，而变为商务合同或自雇等，这些都不属于传统社保制度或者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范围。如果法律法规所覆盖的劳动者群体越来越小，则需要考虑调整法律法规本身了。

第 8 期：

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程序与组织机制 ——揭开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黑箱

2019年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江飞涛来访我院，为师生带来“问政暨南”第8讲，分享了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相关研究。

江飞涛副研究员的报告介绍了产业政策的基本背景以及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程序与组织机制，分析了当前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了解决思路与建议。



江飞涛副研究员

产业政策制定的基本背景

产业政策这一概念，从不同的层次、尺度与视角来看，有着多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被称为选择性产业政策，此类产业政策主张政府对于市场进入、产品价格、生产要素配置与要素价格、投资等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而随后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则认为，虽然政府仍应扮演重要角色并应采取积极行动，但应尽可能避免采用选择性产业政策，而是通过完善市场制度，改善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等方式来实现以上目标。

纵观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国家结合各自国情与政体，采用了不同产业政策。例如欧盟地区主张一个在开放与竞争环境下的产业政策，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市场友好”的功能性产业政策）来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及竞争力提升。而美国则采用了一个隐形的产业政策立场，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但较少采用直接干预市场机制及竞争的方式。

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

回到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政策主要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与产业布局政策构成，并高度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中国产业政策的主要层级由三部分构成：第一层级是国务院颁布的产业政策；第二层级是国务院各部委的产业政策；第三层级是各级政府及部门所颁布的产业政策。

在实施的工具上，中国产业政策指导有着丰富的工具，例如土地供应、财政补贴优惠、政策采购等等。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是以下四类：目录指导、投资核准与准入管制、土地供应、强制性淘汰淘汰关停产能。例如长期以来限制小高炉的发展，则通过制定限制高炉容积规格的大小来逐步淘汰一批过剩产能。

中国政策的制定中有着不同的制定流程与组织机制，它主要发生在行政部门中。其中国务院是最高层次的行政组织，负责协调、审议、批准与发布重要或全局性的产业政策。在重要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务院各部委则扮演组织者、起草者的角色，在部门政策制定过程中还扮演着审议者、批准者与发布者的角色。

同时，在跨部门的政策合作中，往往还有一个“牵头部门”下的部门合作。尤其涉及多个部委职能的产业政策

制定时，需要“会签”达成共识。在这些行政部门之中，国务院及国务院领导人、部长（委主任）承担着决策者的角色。由他们来决定政策制定程序的启动、协调不同部门之间利益与意义以及审议与批准政策。部委及技术型官员则承担着发现政策议题、向上反映或者建议政策议题、组织相关政策研究及政策草案的制定、征求各意见等方面的工作，并被赋予了相应的权责。

除了行政角色外，一些官方、半官方与民间机构在产业政策制定上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各部委的咨询决策机构，以及民间、高校智库、官方或半官方的行业协会，这些决策咨询机构通常能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向决策层与部委技术官员表达自己对于政策议题的看法、意见及建议，并能参与到政策的讨论及起草中，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

中国产业政策制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需要提出的是，21世纪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决策越来越制度化，但从政策主体行为、相互影响及其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来看，当前的产业制定过程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

第一，行政部门主导政策制定过程与产业政策的部门化倾向。行政部门既是产业政策的执行部门，又是评估部门。在这一制定模式下，部委及其技术官员很难超越部门利益，往往会依据部门化利益，寻求更多的自由裁决权、更多的财政资金以及承担更少的责任。

第二，封闭决策过程、利益相关者有限参与对产业政策质量产生影响。由于当前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封闭性与不透明性，缺乏不同相关利益者表达诉求的沟通机制。这一方面影响到地方相应部门难以获取足够信息制定高质量的政策。另一方面，参与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相关利益者，有选择性地披露信息甚至是披露错误的信息，误导决策部门与决策者，从而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

第三，跨部门政策制定中的会签制度与产业政策的碎片化。由“条块分割”行政部门主导的产业政策制定机制，还带来了政策碎片化、政策模糊化的倾向。由于政策出台的唯一标准是参与者各方（主要是部委）达成共识，这往往导向折衷式而非择优式的政策结果，当政策涉及多行政部门，有影响力的相关利益者，最终的政策方案倾向于模糊、笼统、碎片化与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当前的大部制改革中,虽然通过部门调整可以一定程度改善部门利益化和碎片化问题,同时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化素质提高,有助于制定和实施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但片面地强调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化以及专家参与的改革思路,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产业政策制定上面临的机制与程序缺陷问题。

改进中国产业政策制定的一些建议

一方面,更好地制定政策,需要调整与重构当前的产业政策组织实施的机制与程序,产业政策的制定、决策权

跟执行、评估分离。另一方面,建立审议会制度,并公开透明的审议过程。在日本的审议会中,各方的观点都记录在案,公民可以查阅这些观点发言。如果学者偏离专业性的角度,站在利益方的立场上参与政策制定,公开透明的审议过程则能够确保各方的发言不依据相关利益方。

IESR+

第6期：运营商时空大数据助力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新探索

2018年12月27日,智慧足迹城市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荣冲作客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公开系列讲座,做了题为“运营商时空大数据助力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新探索”的报告,与大家分享联通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中的应用。

报告首先指出传统的数据采集方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包括样本量不足、数据质量难以保障、数据采集不具备完整性和连续性等,而联通大数据资源则可以有效克服上述缺陷。

联通手机信令作为时空大数据的天然采集器,可以在不被用户感知的情况下,将观测对象追溯到自然人,并做到数据实时更新。同时,在联通用户数据的基础上,智慧足迹有机地融合了京东、银联智慧、腾讯地图等其他互联网大数据库,从而使得更科学、更全面的数据建模及分析成为可能。

在具体应用中,智慧足迹大数据可以做到对网格、区县、城市、省域、全国等不同空间尺度下的人口分布、人口迁徙等进行准确刻画和分析。具体地,在职住空间、人口动态分布、出行特征、入境游客、特定人群属性等的分析上,都能提供多维度、多来源的数据支撑。最后,在城市管理层面,智慧足迹大数据可以成为城市规划监管和交通实时数据监管的智能平台,并有效优化城市交通运行。



智慧足迹城市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荣冲

第7期：基于疾病防控需求的监测数据分析利用

2019年3月2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专家周脉耕博士作客我院 IESR+ 系列讲座,进行题为“基于疾病防控需求的监测数据分析利用”的分享。周脉耕博士从人群疾病负担研究、基于危险因素控制场景下的疾病预测、健康影响因素研究、环境与健康研究、干预(政策)效果评价等方面做出分析。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专家周脉耕博士

讲座伊始,周脉耕博士首先简单介绍了我国面临的形势。中国正处在快速健康转型时期,面临慢性病和传染病的双重威胁,疾病防控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而这一工作得益于当前技术水平,也有了许多数据支撑。我国的疾控检测系统和体系已经越来越发达。

对于疾病防控的研究内容,首先要从人群疾病负担开始。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 BOD),即系统、科学、全面地量化疾病、伤害以及危险因素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年龄和性别人群中造成的具有可比性的健康损失。

其次,周脉耕博士介绍了基于危险因素控制场景下的疾病预测情况。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根据WHO对全球2025年主要慢性病控制目标的建议,疾控中心进行了多项模拟、预测、数据分析工作。

另外,周脉耕博士还举例说明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尤其是前瞻性研究(CPS, CKB)。例如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CKB),包括糖尿病与死亡率的关系(JAMA)、辣椒摄入与死亡的关系(BMJ)等。

最后,周脉耕博士以PM2.5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为例,分享了环境与健康研究、干预(政策)效果方面的内容。

乡村振兴政策简报

促进农村教育公平， 助力广东乡村振兴事业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韩昱洁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是一项用于改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重要战略。如何通过发展乡村让农村的孩子未来不再贫困，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教育将在解决这一难题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先行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并强调要推进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一、推进农村教育公平的背景

农村留守儿童是农村教育的重点对象。根据民政部2018年的农村留守儿童排查数据，仅仅是双亲都外出打工或双亲一方外出而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农村户口留守儿童就有697万。广东作为人口流动和人口总量的大省，2016年民政部排查数据显示留守儿童规模约为25万。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亲情关爱而感到孤独，甚至出现心理问题；同时有部分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正面引导而不重视学业甚至很早辍学。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缺乏优质的资源和令人满意的教育质量。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均衡发展，2001年正式开始实施撤点并校的政策。撤点并校主要通过撤销、合并办学条件小、弱、贫的学校，开办大规模、高质量的学校。然而，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农村儿童上学距离增加，交通费用和生活费用上涨等，这对许多本身收入就不高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加剧了生活压力。

二、广东省农村教育现状与问题

（一）义务教育落实有待加强。广东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落实情况有待改善。课题组在对比2018年广东16-30岁的农村中青年人群各教育程度的占比和2010年全国农村中青年人群各教育程度的占比时发现，在广东农村，占比最高的是初中文化水平人口（48.60%），其次为高中文化水平（20.64%）；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广东农村中青年占比为14.39%，稍高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普查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农村中青年群体的占比（13.38%），表明广东农村有更大比例的中青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广东农村初中年龄阶段儿童的在学率有待提高。2018年广东农村儿童的小学毛入学率（指某级教育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为100.3%，与2016年广东全省的小学净入学率（指某级教育在相应学龄人口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相等，与2016年全国儿童的小学毛入学率基本持平，同时全省小学年龄阶段农村儿童的在学率（某年龄阶段在校生数占相应年龄阶段人口总数比例）为99.5%。广东农村儿童的初中毛入学率为95.6%，低于广东全省和全国初中毛入学率，且全省农村初中年龄阶段儿童的在学率为95.2%，说明广东省农村义务教育的控辍保学措施基本完成，但有待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初中阶段。

广东农村儿童小学毛入学率存在区域差异，粤西毛入学率相对较低。2018年广东农村小学毛入学率最高的地区珠三角农村地区（108.6%），粤西农村地区的毛入学率最低（94.5%）。四个地区小学年龄阶段的儿童的在学情况较好，在学率均高于99%。另外，粤西农村地区小学年龄阶段在学儿童就读小学的比例在四个地区中最低，而就

读幼儿园和初中的比例最高，这可能是造成粤西农村地区小学毛入学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广东农村儿童初中毛入学率珠三角地区最低，粤东地区初中在学率最低。珠三角农村地区的毛入学率最低（87.0%），而其在学率最高（98.3%）。结合珠三角农村地区初中年龄阶段在学儿童就读高中的比例最高，说明珠三角地区初中毛入学率较低的一个原因是较多初中年龄阶段的儿童已经进入高中。

（二）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近半，留守儿童学业与非留守儿童无显著区别。广东省农村留守儿童的占比近半，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45.41%，比段成荣用2010年六普数据计算的广东农村留守儿童占广东农村儿童的比例略高（42.56%），高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的比例（28.52%）。

学龄农村留守儿童的成绩与农村非留守儿童没有显著差别，且按性别和年龄阶段分组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均没有显著的成绩差别。但父母外出会影响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目的是为了解决留守儿童亲情失落、心理失衡等问题，促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调查数据显示，6%的行政村已经建成并开始使用留守儿童之家。

（三）村内无中小学增加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支出。90%的行政村里有小学，而仅12%的行政村里有初中，这可能是农村撤点并校的结果。数据显示，小学和初中大多分布在人口更多的“大村”。

村中没有小学或者初中对家庭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上涨，尤其是生活费用上涨较多。村中没有小学的小学年龄阶段农村儿童教育相关总花费为3061元，而村中有小学的同龄儿童的平均教育花费仅为1927元，相差1134元。村中没有初中的初中年龄阶段农村儿童的教育相关总花费为3672元，而若其村中有初中，其平均花费为2254元，相差1418元。教育花费中，与生活费用与村中是否有相应学校的关系较紧密。村中有小学或者初中，相应年龄阶段的儿童在与教育相关的生活费上的支出会比村中没有相应学校的儿童的支出分别高1142元和1305元，分别占总花费差距的101%和92%。这可能是由于村中没有学校的学生需要花费更高的交通费，或因寄宿产生了住宿费、伙食费、生活费。而在成绩和在学率上，两类儿童并无显著差异。

三、政策建议

（一）需要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

虽然广东的经济总量在全国领先，其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主要变化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为了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加大农村学生的生活补助，提升乡村教师的待遇，并提高乡村教育水平。

（二）促进随迁子女教育公平

广东留守儿童群体的基数和比例都较大，这些孩子不能跟随父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出打工的城市对孩子入学要求有诸多限制。如果城市能够保障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将得到关键性的解决。一方面，可以通过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鼓励流动人口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可以逐步解除社会福利与户籍制度的关联，淡化包括子女入学等政策规定中对户口的特殊要求，使流动人口子女在就学方面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三）撤点并校要慎重结合学校布局调整方案

撤点并校的初衷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均衡发展。从1997年到2016年，农村地区小学数量几乎减半。这一过程不仅压缩了教育财政的比例，还对农民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各地政府在调整乡村学校布局的时候能够更加慎重，根据乡村的具体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调整方案，将可能缓解撤点并校对农村学生和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居住在没有学校的行政村相应地增加了学生生活方面的教育支出，因此建议政府应该在计划撤点的同时调整合并学校的后续配套建设并加大对居住偏远学生的生活补贴，尽量减轻撤点对农村家庭带来的生活压力。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完善广东农村卫生公厕建设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李承政

农村“厕所革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建设美丽乡村中具有标志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厕所革命”，他多次强调：“要在农村来一场‘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进一步指出“大力开展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建设和改造，同步实施粪污治理，加快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也明确提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配套建设公共厕所，加强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有效衔接”。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过去三年在全省“厕所革命”行动中取得一定的成效，新建和改扩建厕所4500余座，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或无害化厕所覆盖率已提升至高位水平，但粤东、粤西和粤北等地区与珠三角地区之间差距仍比较明显，全省农村公共卫生厕所覆盖率并不高，并且在建设资金筹措、日常管理与维护等方面存在困难，农村公共卫生厕所的设计和规划布局也不够合理。解决当前不足需合理的顶层设计，本文就此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一、广东农村“厕所革命”：成效与目标

广东省委、省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广东各地区农村卫生厕所、无害化厕所建设与管理，2015年以来在新建和改扩建厕所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截至2017年底，全省农村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5.36%，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93.04%。随着农村地区卫生户厕和无害化户厕普及率的稳步提升，我省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防控有效率得到提升。根据广东省疾控中心监测分析，从1999年到2017年，全省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的报告发病率分别下降了88.21%、52.52%。

为进一步推进广东“厕所革命”，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制定了《广东省“厕所革命”新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提出计划在未来三年，全省新建和改

建农村公厕10000座，到2020年实现城乡文明公厕全覆盖，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100%，基本实现各市厕所数量充足、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服务到位、卫生环保、如厕文明的目标。

二、广东农村“厕所革命”：现状与问题

（一）广东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发展现状

虽然广东各地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和户用无害化厕所的普及率已经达到高位水平，但当前广东省仍有105万户农村家庭没有配备户用卫生厕所。与此同时，全省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对乡村公共卫生厕所服务需求的急剧上升，因此，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将在改善贫困农民群众生活品质和提升乡村旅游体验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针对农村公共卫生厕所普及率、建造年份、资金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广东千村调查所得到的具体结果如下：

1. 广东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厕所普及率有待提高。一是公共卫生厕所普及不充分，行政村层面拥有公共卫生厕所的村庄比例为58.70%，自然村层面拥有公共卫生厕所的村庄比例仅为29.52%。二是公共卫生厕所普及地区不平衡，表现在珠三角地区的公共卫生厕所普及率明显高于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珠三角地区的行政村有公共卫生厕所的比例为70.45%，非珠三角地区行政村有公共卫生厕所的比例仅为53.19%。

2. 广东农村公共厕所覆盖率增长提速。随着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拥有公共卫生厕所的村庄数量逐步增加。1990年之前，138个行政村样本中只有12个拥有公共卫生厕所，210个自然村样本中只有2个拥有公共卫生厕所。2000年以来广东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增量很大，分别有63%的行政村公共卫生厕所、81%的自然村公共卫生厕所建立于2000年之后。2010年以来，修建公共卫生厕所的自然村的数量增加得很快，大约56%（拥有公共卫生厕所）的自然村的公厕修建于这段时间。

3. 修建公共卫生厕所的资金来源以自筹为主。从修建公共卫生厕所的资金来源上看，近半数的村庄（行政村为46%，自然村47%）修建公共卫生厕所的资金来自本村自筹，小部分行政村修建公共卫生厕所的资金来自政府补贴（22%）或政府和村分摊（21%）。自然村修建公共卫生厕所的资金来自行政村、政府补贴以及上级补贴、本村分摊的比例分别为15%、18%和11%。少部分行政村（约5%）与自然村（约3%）通过对口帮扶单位提供的资金修建了公共卫生厕所。目前为止，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厕建设与管理的并不多见。

（二）广东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存在的问题

1. 农村公厕建设资金难题。修建农村公共卫生厕所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投入。仅建筑材料和人工费用至少需要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加上长期的管理与维护，对于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不少边远农村根本无法自主筹措足够的资金来修建和管护公共卫生厕所。

2. 农村公厕设施简陋，缺乏设计标准。在广东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不少村庄的公共厕所是村民自行搭建的，并没有按照一定的标准设计和建造，部分公厕设计无法有效地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厕所内气味难闻、设施简陋，甚至缺乏洗手池和自动冲水设备。这类农村公厕并不符合卫生与无害化的要求。

3. 农村公厕日常管理和维护缺失。不少地方的农村公共厕所缺乏日常保洁，便盆内存在积粪、洗手盆堵塞、厕纸满地、积水渗水等问题突出。农村公共厕所的管护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对于诸多村庄来说，保洁人员缺失、招工难以及缺乏足够的预算等都是公厕管护面临的难题。

4. 农村公厕规划和布局不尽合理。一些地区农村公厕位置较偏，无厕所（尤其农村老人）面临夜间如厕不便的问题。此外，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广东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迅速增长，农村公共厕所配套不足的问题迅速暴露出来，乡村旅游过程中“找厕难”、“如厕难”问题相当严重，直接降低了乡村旅游的体验。

三、广东农村“厕所革命”：政策与建议

一是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从资金上扶持贫困地区农村修建和管护公共卫生厕所。贫困地区农村的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难以自筹资金修建和管护公厕。提升全省乡村公共卫生厕所普及率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资金支持，尤其是对边远的贫困村。建议设立农村公厕财政专项资金，用于农村卫生公厕的建造与管护。

二是创新筹资模式，破解修建农村卫生公厕的资金难题。除了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给予财政支持外，还应该创新资金筹措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厕建设和运营管理之中。部分有条件的地区（比如生态旅游村、文化村、红色革命村）可以先进行试点工作，探索“以商建厕、以商管厕、以商养厕”的新型模式，广泛利用社会资本来缓解资金难题。

三是强化激励机制，管理和维护好农村公共卫生厕所。包括公厕保洁在内的日常管护工作是维持农村公共厕所基本功能的重要保证。建议创新激励机制，解决好保洁人员缺失、保洁员招工难问题。比如，将保洁工作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职业培训并安排村内贫困户从事村庄公共卫生厕所保洁工作，既解决了贫困户就业问题，也实现了贫困户脱贫的目标。

四是完善卫生、无害化厕所设计标准，合理规划和布局农村公厕。建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制定农村公共卫生厕所的最低标准，使其满足卫生、无害化的基本要求。农村公共卫生厕所要求满足以下四点：（1）有水引入；（2）有冲水设备；（3）有大三格化粪池；（4）有保洁服务。最后，各地区要合理规划和布局农村公厕，使其布局合理，尽量靠近那些缺乏卫生户厕的贫困居民，同时确保其位置好找，容易定位，有效解决乡村旅游中面临的“找厕难”、“如厕难”问题。

动态瞄准扶贫目标， 夯实广东精准扶贫工作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牛梦琦

2016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广东省委、省政府作出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以4000元为新的扶贫标准，全省认定相对贫困村2277个，相对贫困人口70.8万户、176.5万人，明确到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总体目标。至2017年底，全省有劳动能力相对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93元，累计约116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预脱贫，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发生率从4.54%降至1.52%以下。

本文分别就广东省精准扶贫的实施现状、主要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广东省精准扶贫实施情况

广东省以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000元（2014年不变价）作为相对贫困人口的认定标准，同时要求综合考虑“三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和家庭支出等实际情况进行评议。“广东省千村调查”访问了农户“你们家是否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并且详细统计了农户的各项收入。从“广东省千村调查”数据来看，2018年广东省精准扶贫比例约为6.69%，相对贫困率约为1.93%。而广东省公布的2017年底官方相对贫困率为1.52%，调查的结果略高于官方统计。分区域来看，珠三角地区精准扶贫率和相对贫困率水平均低于东翼、西翼和山区三个区域，其中东翼、西翼的扶贫压力最大。

二、广东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一）“精准扶贫”目标有待动态化瞄准

在识别扶贫对象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支出因素，支出方面应该侧重农户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和改善住房三个方面的投入和消费。我们比较了精准扶贫户和收入最低10%农户的相关特征，发现精准扶贫户和非精准扶贫户在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背景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从人口结构来看，精准扶贫户家庭总人口更少，求学人口更多，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比

例更高。从社会经济背景变量来看，精准扶贫户的人均非农劳动时间、人均外出工作收入、外出工作寄回家的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均高于收入最低10%的农户。由于2017年精准扶贫户部分收到了政府发放的扶贫款，为了剔除这部分因素的影响，我们计算了精准扶贫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去扶贫款）。精准扶贫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高于收入最低10%的农户。

目前来看，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并非瞄准收入最低的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精准扶贫”目标的选取不合理。尽管精准扶贫户的平均收入状况好于最低收入10%的群体，但是他们面临家庭劳动力配置不足和抚养压力过重的问题。另外，问卷中的收入部分询问的是现在的收入，并没有追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前的收入情况，虽然我们尝试在收入中剔除扶贫款，但是仍然不够准确。因此，精准扶贫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高于收入最低10%的家庭，可能本身是扶贫政策的效果。

（二）行政村扶贫款的利用仍需加强管理

2016年至2018年，我省各级财政支持新时期脱贫攻坚一揽子资金安排主要包括“扶贫开发”、“低保兜底”、“专项保障”等三大方向。从全省整体来看，有86.86%的精准扶贫户收到了扶贫款，其中珠三角地区达到94.44%，东翼地区最低，发放率只有82.76%。总共有75%的行政村全部精准扶贫户都收到了扶贫款，其中珠三角地区最高，达到90.9%，粤西地区最低，只有70.8%。同时，全省总共有5.6%的行政村，所有的精准扶贫户均表示未收到扶贫款，山区未收到扶贫款的村庄比例高达12.5%。广东省农户收到的扶贫款平均达到7904元，但是地区之间差异很大。珠三角地区户均收到扶贫款仅为2914元，而西翼地区达到11082元，相差近三倍。

无论扶贫资金是由本省、市、县下达，还是来自对口帮扶单位或者外来企业，村民最终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收到各类扶贫资金的概率确实越高。村民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

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扶贫款的比例高达88.65%，灵活使用的比例较低只有8.86%，相比之下，村民未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按规定使用扶贫款的比例只有85%，灵活使用的比例高达15%。村民未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主要将扶贫款用于办公支出和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这里的办公支出包括“村干部补贴与办公费用”、“办公经费”等项目。事实上，有关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规定明确指出，扶贫开发资金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和各项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村民收到扶贫款的行政村，扶贫款主要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村公益事业。总体来看，行政村层面扶贫款管理的规范化程度直接关系到村民最终是否能收到扶贫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广东省西翼和山区还有待加强扶贫款的管理。

（三）精准扶贫产业工程项目参与率有待提高

精准扶贫八项工程包括产业发展扶贫工程、劳动力就业扶贫工程、社会保障扶贫工程、教育文化扶贫工程、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扶贫工程、危房改造扶贫工程、金融扶持扶贫工程、资产收益扶贫工程。农户参与社会保障扶贫工程的最多，参与项目分红扶贫的最少。尽管农户会将扶贫资金的一部分投入农业生产，但更多的是将资金投入生活消费、看病就医、子女教育和建房等民生方面。存入银行和投入收益项目的农户非常少。产品发展扶贫项目中，“产业扶贫”、“光伏扶贫”和“一村一品”三大政策的推广和参与效果最好。

三、有关推进广东省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一）精准确定扶贫对象，需要考虑长期收入能力和家庭负担，实现动态化瞄准。精准扶贫的要义在于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贫困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扶贫对象精准是实现其他五个精准的首要条件。要实现动态化精确瞄准，行政村要随时走访更新村民家庭情况，保证扶贫户及时进入和退出“精准扶贫”项目。区分农户致贫是长期收入能力受限还是短期家庭负担过重，针对不同情况向农户推广不同的精准扶贫工程项目。

（二）精准使用扶贫资金，需要规范行政村管理机制，兼顾村民长、短期收益。2018年广东省将安排616.8亿元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历年规模最大，加上其他用于“三农”的资金，支农资金总规模将达1054.54亿元。尽管从省级财政来看，整个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非常强，但是只有86.86%的精准扶贫户在2017年收到了扶贫款。行政村在推行精准扶贫工程和发放扶贫款方面存在一些权衡，精准扶贫产业工程实施力度更大的行政村，农户直接收到扶贫款的概率下降。精准扶贫产业工程从长期来看可以产生造血功能，但是短期改善精准扶贫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可能效果有限。我们认为村委会应该兼顾长、短期收益，根据行政村和精准扶贫户本身的情况，因地制宜，实现扶贫资金的效益最大化。

（三）精准安排扶贫项目，需要行政村加大对产业扶贫工程的推广，切实帮助农户增加收入，提高农户参与产业扶贫的积极性。从千村调查的结果来看，目前村民参与产业扶贫工程的热情还不是特别高涨，而参与民生扶贫工程的几率更高。民生扶贫花钱少，见效快，但容易导致新致贫、返贫。扶贫如果要实现“断穷根”，必须推广产业扶贫机制，将产业扶贫视为重中之重。我们建议，一方面，产业帮扶要实现精准化，量身定做产业帮扶政策，合理调配统筹扶贫资源。另一方面，产业帮扶要花大力气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变成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要善于建立有特色、有规模、有实效的扶贫产业链条，真正把贫困群体纳入到精准帮扶的产业链条主体中去，实现持续发展和永续脱贫。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奠定乡村振兴基石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李书娟



清远（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来到广东清远农村考察再次指出：“既要加快脱贫致富，又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治理是其中的基础一环，关系乡村振兴的成败。乡村治理是否有效，不仅决定着乡村社会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十九大明确提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具体内容，就是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本文对广东乡村治理现状进行了总结，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广东乡村治理的现状特点

（一）广东地区宗族文化盛行，单姓村较为普遍

在广东地区，祠堂文化较为盛行，有第一大姓祠堂的比例较高，平均71%的村有第一大姓祠堂。其中以东翼地区为最，接近93%的村都有第一大姓祠堂。这可能与当地鲜明的地区文化有关，东翼地区主要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梅州、汕尾，属于传统潮汕文化及客家文化地区，这一地区的传统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保留与传承。山区次之，平均76%的村有第一大姓祠堂。相比较而言，西翼地区和珠三角的祠堂比例则低得多，不到60%。

从老人会这一民间传统组织来看，广东平均有老人会的行政村比例不算太高，但东翼地区一枝独秀。总的来说，广东省有老人会组织的行政村平均为48%，不到一半。其中珠三角地区最低，不到20%的行政村有老人会。西翼和山区地区稍高，分别为46%和33%。东翼则形成鲜明对比，有老人会的行政村比例达到了约86%，远高于广东其他地区。

同宗同源的单一姓氏村落也是广东乡村结构的重要特征。从第一大姓占比来看，一个村平均一半的人共用一个姓，东翼地区这一比例更高。总体而言，广东农村行政村第一大姓人口占比平均约为50%。珠三角、山区和西翼地区则低于平均值，第一大姓人口占比分别为48%、44%和46%。东翼地区这一比例更高，第一大姓人口占比为70%，这意味着，在10个人中，就有7人拥有相同姓氏。

（二）村议事方式多元，集体重大决策公示

总的来说，受访村在做重大集体决策时，主要是通过民主投票、村干部投票和上级政府决定三种方式，老人会等宗族组织影响有限。具体而言，约37%的重大集体决策是由上级政府作出，约68%的重大集体决策由村民大会投票作出，还有约27%的重大集体决策由村干部投票作出。老人会在作重大集体决策时的影响有限，只有约5%的由老人会决定。

集体重大决策基本在决定前进行了公示。有95%的受访村在集体重大决策决定前都进行了公示，有4%的是“部分公示、部分没有公示”，只有1%的没有在决定前公示。分地区来看，东翼地区和西翼地区公示比例最高，达到96%，山区次之，珠三角相对最低，为91%。

（三）广东乡村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

总体而言，当前广东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尚不充分。当前提供了清洁卫生公共服务的自然村比例为60%，提供

了贫困家庭关爱公共服务、残疾人照顾、老年人照顾的自然村比例分别为54%、46%和40%，提供了少年儿童关爱服务的比例最低，约31%。

不平衡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现在公共服务购买方面。分地区来看，珠三角与东翼、西翼、山区地区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相比呈现不平衡特征。珠三角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领域集中在残疾人照顾、贫困家庭关爱及卫生清洁，三者比重几乎一样（接近80%）。而在东翼、西翼及山区地区，公共服务购买领域分配比较均匀，普遍不足60%，皆低于珠三角地区，在贫困家庭关爱和卫生清洁方面比重稍高，但总体上与在老年人照料及少年儿童关爱及残疾人照顾方面比重差别不大。



广东某乡村（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广东乡村治理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宗族组织影响力，有效服务乡村治理。

宗族文化浓厚是广东农村的一个鲜明特色，要充分利用宗族组织为广东乡村治理服务。一是，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特殊作用，引领他们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打造新时期乡村治理新格局。二是，发挥宗族在扫黑除恶中的预防作用。通过宗族的血缘关系，在预防、教育方面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把恶势力、小问题扼杀在萌芽中。三是，发挥宗族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带动作用。乡风文明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也是重要手段，有了良好的乡风文明，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四是，发挥宗族能人在乡村发展致富中的助推作用。宗族中在事业及学业等方面的成功人士，在乡村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二）警惕强大宗族势力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对宗族组织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不能忽视的是，宗族势力过强可能导致乡村利益集团化，阻碍民主管理。具体表现在：一是，可能对基层民主选举造成干扰。在宗族势力过强的地区，可能会出现某些宗族为了本宗族的利益参与甚至操纵村委会选举。二是，可能破坏村民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在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中，各家族为了将本族的精英分子选进村委会班子，可能采取互相串通、走访拉票等不正当手段来影响选举结果。这些精英可能会在村集体事务决策时偏向于照顾本家族的利益。例如，在广东千村调查的过程中，有受访村民反映“在村上没有说得话的人”。

（三）大力开展乡村技能人才培养，应对乡村人口空心化问题。根据广东千村调查样本，全年外出务工人员已婚的比例（53%）更低，担任或担任过村干部的比例（0.3%）更低，更为年轻（16-24岁占比25%，25-34岁占比47%），教育程度更高（高中学学历占比18%，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12%）。这使得农村人口在年龄上分布不合理、乡村治理参与主体断层，村领导班子无法注入新生力量、治理方式固化，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村民的多元化需求。对此，一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引进和造就各种专门人才。二是，扩展渠道、创新制度，合理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乡村政治参与。适当增加外出人口作为村民代表的比例，合理调整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大会、村委会选举时间，严格控制委托投票，保障外出流动人口能够参与到村庄的公共事务管理中。三是，切实保障农村三留守群体的应有权利，对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要保证他们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权利。

（四）提高村民在集体事务中的参与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村集体重大决策是否公示这一问题上，村干部和村民的回答结果并不一致。比如村干部的回答显示95%的情况下重大集体决策都进行了公示，但是在精准扶贫的家户问卷中关于精准扶贫户的确定公示率低于这一比例。农村重大集体事务主要包括村委财务开支集体资产资源处置集体土地征收及征收款发放、低保（五保）申请、救灾救济款物发放、大病救助申请、发展党员、贫困户申报、贫困户退出等，都是村民比较关心的大问题。提高村民在重大集体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对加强基层民主、提高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程度，以及整个乡村治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对此，应因地制宜，根据广东乡村不同情况，针对不同乡村主体加强培训教育，提高村干部民主素养和村民议事能力。

产业共建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粤东西北人口城镇化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政策研究轨） 卢晶亮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6年广东省委提出大力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旨在以此为抓手，破解长期以来珠三角（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与粤东西北地区（粤东地区指汕头、汕尾、潮州和揭阳；粤西地区指阳江、湛江和茂名；粤北山区指韶关、河源、梅州、清远和云浮）发展不平衡的难题。产业共建的目的一方面是加速粤东西北地区生产力的提升，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是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加快当地人口城镇化进程。近三年来，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逐步上升，本地非农就业比例逐步下降，产业转移园区吸纳本地劳动力的作用有限。粤东地区和粤西地区农村外出务工者中有20%左右选择本地就业，而粤北山区农村只有10%左右的外出务工者选择就近工作。基于上述发现，笔者认为，未来广东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应该注重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继续大力推进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着重发挥产业共建的就业带动效应；二是坚持推进粤东西北地区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发挥中心城区人口集聚效应；三是加快粤东西北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吸引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一、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

2013年广东省政府在《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中，将产业园区扩能增效作为振兴粤东西北的“三大抓手”之一。2016年广东省委提出大力推动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促进粤东西北协调发展。产业共建的目的除了加速粤东西北生产力的提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加快当地人口城镇化进程。

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对于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的作用并不明显。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2季度至2018年1季度，全省42个省级产业转移园区吸纳劳动力总量无明显增长，基本保持在78万人左右，其中本省劳动力数量维持在60万左右，也无明显变化。另一方面，同时期粤东西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逐步上升，从2015年3季度的36.7%上升到2018年1季度的48.4%；而本地非农就业的比例则不断下降，从2015年3季度的16.6%下降到2016年4季度的13.8%，之后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未再公布该指标。以上数据表明，产业共建对于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的作用并不明显，大量农村劳动力依然选择外出务工，主要是前往珠三角地区务工。

二、粤东西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

广东千村调查数据显示，在劳动力流向方面，珠三角吸纳了省内大部分农民工，粤东和粤西地区的产业共建对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成效初显。基于约1400名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样本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粤东西北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8.5%选择前往珠三角地区务工，有18%在粤东西北地区务工，另有3.5%前往省外务工。另外，分地区来看，粤东地区外出农村劳动力中有72.8%在珠三角务工，19.9%留在粤东地区务工；粤西地区外出农村劳动力中有74.1%在珠三角务工，21.8%留在粤西地区务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粤北山区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在珠三角务工的比例高达88.3%，只有10.3%留在粤北山区务工。以上对比分析表明，随着产业共建的推进，粤东和

粤西地区的产业发展已经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形成了一定的吸纳能力，而最为落后的粤北山区在解决当地农民就近就业的能力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在务工收入方面，留在粤北山区务工的少数当地农村劳动力因为高收入的补偿才没有流向珠三角或省外。粤东西北外出农村劳动力在珠三角务工月收入的均值为3050元，中位数为2750元；在粤东西北地区务工月收入的均值为2558元，中位数为2166元；而在省外务工月收入的均值最高，达到4024元，中位数也最高，达到3658元。分地区来看，在粤东地区和粤西地区务工的平均月收入分别为2376元和2391元，而在粤北山区务工的平均月收入达到3208元。总体而言，尽管粤北山区的少数当地劳动力收入较高，但当地非农就业机会不多，对当地农村劳动力缺乏吸引力，只有十分之一的粤北山区农村外出劳动力选择在本地务工。

三、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为了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非农就业，加速推进粤东西北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关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坚持推进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共建，着重发挥产业共建的就业带动效应，政策适度向粤北山区倾斜。产业共建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不能忽略其就业带动效应。产业发展确实会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如果能够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则是最理想的情形。目前看来，粤东地区和粤西地区的产业发展已经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有20%的当地外出农村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而粤北山区的情况则不理想。历史上来看，粤北山区在各方面较为落后，贫困人口较为集中，是粤东西北振兴战略规划中的短板，产业共建政策应该对粤北山区有所倾斜，切实提高其解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

（二）继续坚持推进粤东西北地区中心城区扩容提质，发挥中心城区人口集聚效应。粤东西北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产业聚集与人口聚集同时发挥作用。实现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才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的。目前看来，粤东西北地区各自的中心城市汕头、茂名、韶关的资源聚集、人口聚集、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的作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产业共建带动就业集聚，扩容提质增强城

市人口承载能力，两者共同发力才能更好地吸引粤东西北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和落户城镇，带动粤东西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加速提升。

（三）加快粤东西北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吸引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目前，广东省常住人口向珠三角中心城市聚集的趋势仍十分明显。广东省将努力在2020年实现1300万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其中包括省内人口600万，省外流动人口700万。但长期来看，珠三角各大城市，尤其是广州和深圳两个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会有所控制，并且会吸纳相当部分的省外流动人口。而在省内，推动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就是在粤东西北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多个城市目前的落户政策是，合法稳定就业满3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满3年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广东千村调查的数据显示，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特征是年富力强、教育程度较高、未婚比例较高，他们正是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应该是粤东西北地区人口城镇化所要重点吸引的对象。笔者认为，粤东西北地区城市应当进一步适度放宽落户条件，鼓励和吸引当地农民就近落户城镇，长期稳定就业，真正形成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

着力农村环境突出问题， 实现广东乡村可持续发展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李承政



（图片来源于网络）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畜禽粪污处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收、病虫害绿色防控。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和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实施农村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推进重金属污染耕地防控和修复，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严禁工业和城镇污染向农业农村转移”等一系列具体要求。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广东省环保厅等单位高度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先后出台了《广东省农村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和《广东省环保厅关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十三五”规划》等政策文件，着力改善广东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

一、广东农村地区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水土流失问题比较普遍

水土流失问题或将成为广东农村地区面临的一个潜在生态风险，调查发现水土流失程度为一般或者严重的村庄比例比较高（占比约43%），主要集中在揭阳（3个行政村）、湛江（3个行政村）和河源（2个行政村）三个地级市。此外，

土地盐碱化（盐渍化）主要集中在粤西沿海和珠三角地区的村庄，土地沙漠化村庄主要集中在粤西地区。

（二）农户施用化肥农药比例高，用量地区差异明显

从事种植业的农户生产过程中施用化肥与农药的比重高（分别为88%和86%），施用农家肥的农户比重稍低一些（约68%）。2017年农户平均化肥施用量约为354千克，亩均化肥施用量为161千克，亩均化肥花费为610元。农户施用最多的化肥是复合肥（58.6%），其次依次为氮肥、磷肥和尿素等。2017年农户亩均农药花费为251元。分地区来看，东、西两翼地区的农户亩均化肥和亩均农药花费支出要明显高于珠三角和山区的农户，东翼农户亩均化肥花费为794元左右，西翼农户亩均农药花费约为304元。此外，调查发现一些村庄推行过化肥农药两减政策（占比54%）或进行过测土配方施肥（占比28%）。

（三）村庄附近高污染工矿企业种类繁多，管制措施有待加强

100个调查的行政村中有9个周边有矿山开矿，40个行政村附近建有工厂。矿山类型主要为各类石矿和重金属矿，工厂企业类型则种类繁多，包括五金厂、陶瓷厂、竹木材加工厂、皮革厂、造纸厂、印染厂、石灰厂等带有污染性质的工业企业。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将近七成的行政村采取过环境污染管制措施。目前污染管制措施以水污染管制措施为主，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管制的比例较低。

（四）耕地污染知晓度低，调查及修复工作尚未全面铺开

从农户问卷调查的情况看，听说过土壤污染的农户占比为35%左右，听说过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农户占比为21%左右。其中，有4个村庄对被污染的土地进行过修复。总的来说，村民对土壤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现象的了解程度较低，这可能由于目前土壤污染调查与修复工作主要集中在污染耕地集中区而未在省内全面展开。

（五）缺水问题不严重，但部分村庄水质待改善

绝大部分村庄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均不存在严重短缺的现象。受访户认为本村生活用水严重短缺的比例为3.6%左右，认为灌溉用水严重短缺的比例稍高，大约在5.8%左右。受访户居民的生活饮用水主要来源为自来水、井水和山泉水（三者合计占比98%左右），认为本村饮用水不干净的村民占比16%左右（含比较不干净（10.2%）和非常不干净（5.7%）），认为灌溉用水不干净的占比24%（包含比较不干净（15.6%）和非常不干净（8.7%））。

（六）生活垃圾处理比例高，但秸秆还田机制尚未建立

村庄生活垃圾基本获得专门处理。93%的受访行政村的生活垃圾会由专门的机构运走处理，67%的村拥有专门的生活垃圾场。对自然村的村民调研发现，大约有40%受访自然村拥有生活垃圾场，90%以上的自然村生活垃圾获得了专门处理。然而，对于农田秸秆的处理方式，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农户采取田间焚烧（占比43%）和运回家做柴火（占比23%）的方式来处理秸秆，并未有效环保地实现秸秆还田处理。

二、政策建议

（一）着力治理水土流失，应对盐碱化（盐渍化）

一是针对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占比12%），继续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推广深耕改土等农业技术措施，努力保持水土，治理水土流失和缓解土地荒漠化。二是对于土地盐碱化（盐渍化）严重的地区（占比8%，集中于湛江和茂名等地市），相关部门应该推广耐盐作物的种植范围，指导农户科学施肥和改良种植制度，减缓和应对土地盐碱化（盐渍化）。

（二）推进农业清洁生产，鼓励发展生态农业

一是积极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全面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进一步推行化肥农药两减政策，探索研究农田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二是鉴于当前农户化肥、农药使用比例仍非常高，建议推广科学施肥方法，提高施肥施药效率。此外，相关部门应给予财政资金扶持，大力推广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鼓励使用有机肥、绿肥，禁止剧毒农药的生产和销售。三是进一步完善绿色生态有机认证制度，鼓励农民种植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

（三）严格工矿企业准入，强化监管和污染治理

一是严格对照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农村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的工作要求，狠抓农村地区工业企业污染防治。清理淘汰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村级工业企业。二是严格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审批，对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不达标的地区，不允许审批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三是加快推进电镀、鞣革、印染、化工、陶瓷、五金、石灰、危险废物处置等重污染行业工业园区建设，要求所有重污染企业全部进入园区，实施统一管理、集中治污。

（四）开展耕地污染调查，治理和修复被污染耕地

一是开展全省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调查，建立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档案和土壤污染分级管理制度。二是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对耕地进行分类管理：（1）对于干净的耕地，必须重点保护，避免其遭受污染；（2）对污染程度较低、仍可作为耕地使用的，采取种植结构调整、农艺调控、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措施，确保其安全利用；（3）对于污染严重的耕地，及时调整种植结构（比如改种非食用作物），对不适宜种植的土地，明令禁止再生产农产品。三是因地制宜开展受污染耕地综合治理试点示范，加速建设出一批受污染耕地土壤治理修复试点示范工程。

（五）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工作

一是继续强化和规范建后管理已建成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加强农村供水行业管理和水质卫生检测，提升农村自来水水质达标率。二是全面推行河长制，明确各级河长的职责，着力保护好农村饮用水水源，从源头上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三是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周边企业排污处理，避免农业灌溉用水遭受污染。

（六）有效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和秸秆

一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尽快让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实现自然村全覆盖。二是建议加强宣传教育，指导农户科学有效地处理秸秆，制定严格的管控措施禁止农户在田间焚烧秸秆，鼓励农户对秸秆进行科学处理，实现秸秆还田。

观点评论

IESR 学者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展望广东 2019 年经济与社会发展

广州塔（图片来源于网络）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广东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一方面，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挑战更多，但另一方面，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态势不会改变。全省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创造了广东经验。综观国内外形势，广东省政府在这一背景下作出的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可谓是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鉴于此，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意邀请了专家学者第一时间就广东省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报告：“一企一策”推动省属国企战略性重组，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聚焦主业，70% 以上省属国有资本集中到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引领性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加强对国有企业债务、资金以及境外资产的风险管控。加快省属特困企业脱困，年底前全面实现省属“僵尸企业”市场化出清。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全面落实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推进经理层市场化选聘工作，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加强国有企

业党建工作，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冯帅章认为，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内容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改革的连贯性，近几年国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效率偏低，偿债能力不足，债务水平过高，因此加快国企中的“僵尸企业”出清，能有效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助推经济提质增效。可以看到，广东省在去年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在这一基础上计划 2019 年底前全面实现省属“僵尸企业”市场化出清；第二是政策的深入性。今年报告中关于国企改革的篇幅不仅较往年增加，政策思路更为具体，例如强调“一企一策”推动省属国企战略性重组，以及进一步聚焦主业，要求 70% 以上省属国有资本集中到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引领性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三是改革路径的明确性。首先体现在深化国企改革要形成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报告中明确要落实好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这意味着国企的工资水平要与市场对标，效益好的国企，工资水平可以更高一些，而效益差的国企，工资水平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关键词：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报告：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上，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加快改善供给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冯帅章认为，广东的制造业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打造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尤为关键。政府的工作报告也提出了要制定出台减税降费方案和具体措施，为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不过，在进一步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需要留意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以市场为导向，要激发企业的微观主体能动性，切实为企业减负，提升营商环境；第二是平衡发展，重视发展高端制造业的

同时，也不可以忽视普通制造业的重要意义，尤其在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上；第三是高端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要采取措施促进校企联动。目前高校“新工科”建设与企业的实际互动仍然较少。需要政府协调破除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让高校的研究成果更多转化为企业的技术创新。

关键词：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报告：扩大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位覆盖率，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韩嘉玲表示，扩大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位的覆盖率，保证了绝大多数的幼儿能够享受普惠性的学前教育服务，并坚持了学前教育公益普惠方向的基本属性，体现了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平性与政府责任。在扩大学前教育总量的过程中，更要重点解决好集中农村困难地区、人口分散地区、留守儿童集中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短缺问题，解决好贫困人群就近入园、方便入园的问题。

此外，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是义务教育的短板，更是农村教育的底部攻坚工程。广东省作为人口外出的大省，也拥有庞大的留守儿童，乡镇寄宿制学校是目前关照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的可行措施。此外，乡村小规模学校虽然学校小，学生人数不多，但是留在小规模学校的学生多数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在校学生，以及无法离开农村、走不了的、最底层 20% 贫困儿童及困境儿童，是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最急需政府确保纳入兜底保障的人群。因此，扩大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位覆盖率，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作法，有利于从教育方面来推进脱贫攻坚及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报告：坚持租购并举，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逐步推进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和新市民住房问题，试点推进共有产权住房建设，新开工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 2.4 万套。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张思思副教授表示，广东省政府当前在广州推行共有产权住房制度是加快建设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建立健全租购并举住房制度的一个

值得尝试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解决一部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借鉴国内外其它城市共有产权房发展经验，广州在发展共有产权房时，可适当增加市区内共有产权房的项目规划，满足市区内大量刚需购房者的需求。在项目距离和房型上听取公众意见，防止共有产权项目出现空置；在配套设施规划上，注重周边医疗，商业配套以及教育资源的分布；在房屋贷款上，允许共有产权房的购买者按照政策性住房有关贷款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商业银行等购房贷款，严禁企业拒绝申购家庭组合贷行为；在准入审核上，为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在制定共有产权房准入规则时广州应在借鉴北京和其他试点城市的经验基础上完善适应本市实际情况的准入规则。

关键词：积极促进就业创业

报告：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落实“促进就业九条”，激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做好异地务工人员就业和困难人员托底帮扶工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进一步降低企业招工费用，帮助困难企业职工稳岗转岗。符合条件的异地务工人员，享受同等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及有关服务。加大创业帮扶力度，支持建设一批面向到乡村创业人员的创业孵化基地。建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完善防范化解劳资纠纷机制，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政策研究轨）卢晶亮表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抬头的情况下，实施就业优先战略，通过各种有效措施稳定就业，完成 2019 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5% 之内的目标，也成为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广东省政府在 2018 年 11 月底提出的《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促进就业九条”），正是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来扩大促进就业。其中适度降低社会保险成本、降低企业招工费用、加大重点用工企业服务力度、支持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等举措都是贯彻深化供给侧改革的精神，进一步的降低企业负担，扩大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广东省民营经济领域的就业占比在 2017 年已达到 54.6%，民营经济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目前阶段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体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难，另一方面体现在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广东省政府通过多种措施激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并且进一步加大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力度来缓解就业

的结构性矛盾。最后，建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不但要确保就业困难人员的生活保障，还要积极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相信始终牢记就业优先的战略，落实“促进就业九条”的各项举措，广东省2019年的就业形势会稳中向好。

关键词: 优化营商环境

报告: 部分基础性、关键性改革还不到位,“准入不准营”等问题仍然突出,政策落实还存在“中梗阻”“最后一公里”“一刀切”等问题,政府作风还需持续改进,政务服务效率有待提高。对这些问题,我们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李书娟指出,为了优化营商环境,近几年来广东省强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不论是在企业进入退出方面,还是在事中事后监管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在许多地区开办企业的速度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例如在南沙1天内可领取营业执照、3天内完成刻章备案和银行开户。原来的“银行开户难”“企业注销难”等改革难点也有望快速解决,李克强总理1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决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将企业注销时间大幅压缩,简易注销时间减少一半。为了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广东省在2018年年底也已经出台“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

仅从企业进入退出的便捷度来看,广东的营商环境整体上得到了很大改善,企业“做起生意来容易了”,但接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可能是更进一步地推进改革开放,更大程度地放开市场,要让市场主体“有生意可做”。进一

步放开市场是更为前端的改革,也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改革。在激发市场活力、动员大众创业的措施已经相对非常到位的情况下,放开市场,让市场主体真正能够做起生意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力量,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市场主体的数量。归根结底,有生意可做,做生意容易,才能真正地激发市场活力。

关键词: 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报告: 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省财政投入161亿元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基本完成县域乡村建设规划,76.9%的自然村启动农村环境基础整治,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4737公里,国省道新建改造277公里,完成中小河流治理2088公里。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李承政表示,加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是广东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任务。我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既要虚心地向兄弟省份浙江省取经,又要努力打造自身特色,建设出一批独具岭南格调的美丽乡村示范区。暨南大学广东千村调查发现,广东各地区自然村生活垃圾场的普及率近有40%,公共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不足30%。完善广东农村人居环境,必须继续完善“户收集、村集中”制度,实现“一村一点”(村收集点)和“一镇一场”(无害化处理场)。此外,农村“厕所革命”和农村污水处理应实现有效结合,加快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民生。

本文首发自 IESR 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019年1月31日文章



羊城(图片来源于网络)

【澎湃】 公办还是民办?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挑战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教授 冯帅章

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韩昱洁



流动儿童在课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努力推进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快速城镇化导致了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同时也使大量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移到城市。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估算,全国流动儿童总数已超过三千万。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事关教育公平,也直接影响中国教育的整体水平。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出台了多项政策以确保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受教育权。然而,尽管各地流动儿童受教育情况有所不同,流动儿童迄今仍然面临不完全公平的教育环境。例如,北京市严控民工子弟学校规模,主要依赖公办学校招收流动儿童。上海市将郊区的民工子弟学校以政府委托办学的形式纳入民办学校监管体系,形成公办学校为主、民办学校为辅的流动儿童免费教育体系。而广州与深圳教育体系更为市场化,民办学校招收流动儿童比例与公办几乎平分秋色。总体来说,从全国范围来看,仍有相当比例流动儿童无法顺利进入当地公办学校,而只能入读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

因此,要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现状,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需要首先理解入读公办或民办学校对流动儿童在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具体机制。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主要是源于中国既有的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现实之间的不协调。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均由县(区)级政府进行分配,很难在不同区域间跟随人口进行转移。因此,流入地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力为流动儿童提供公共教育服务,而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儿童也无法在流入地充分享受到法律所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2001年,国务院首次提出“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2012年中央政府又发布了“两纳入”政策(即地方政府在教育计划和财政预算中纳入流动儿童)。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文件措施,落实流动儿童接受公共教育服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加强。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入读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比例由2008年的60%上升到2014年的79.5%。然而,仍有大约20%的流动儿童就读于民办民工子弟学校。

民工子弟学校对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也面临种种问题。民工子弟学校是市场化的产物,起初是被企业家作为私营企业运营,其重要目的是追求盈利。这些学校主要通过收取学费来运营,但由于生源主要是无法进入公办学校的普通或劣势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收费水平普遍较低。这就导致了民工子弟学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与公办学校差距很大。由于早期的民工子弟学校法律地位不明晰,经常被关停,学校举办者也缺乏进行长期投资的动力。

我们的研究通过在上海搜集的调查数据,探讨流动儿童入读民办小学是否会在短期对人力资本和升学,以及在长期对入读高中的影响。

民办学校教学质量更低

上海是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面临大量的流动儿童,上海市政府积极响应中央“两为主”政策,在2008年1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三年计划”)。“三年计划”要求在2010年底前关闭所有中心城区的民工子弟小学,这意味着居住在市中的所有流动儿童都应当进入公办小学。另一方面,“三年计划”要求关停部分郊区的民工子弟小学,其他的全部都以政府委托办学的形式纳入民办学校监管体系。因此,居住在上海市中心区的流动儿童全部进入公办小学;而住在郊区的流动儿童部分进入公办小学,部分进入民办小学。

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对上海市11所公办小学和9所民办小学的学生进行统一的数学和智力测试。结果发现,入读两类学校的流动儿童智力相当,但学校类型是影响流动儿童数学成绩的重要因素,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数学考试成绩显著比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低。这显示民办学校教学质量更低,入读民办小学对流动儿童的认知能力有负面影响。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继续跟进这些流动儿童的情况,并且发现,随着上海市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支持补贴力度加大以及监管力度加强,2012年的民办学校师资、学生成绩、家长反馈相较2010年都有较大提升。然而,根据学生成绩和家长的满意度反映,民办小学和公办小学之间教学质量仍有相当差距。

民办学校面临不公平制度壁垒

相对于幼升小,流动儿童小学毕业以后在上海继续升学的现状更为窘迫。我们的研究发现,小学毕业学校的类型是决定流动儿童能否进入上海本地初中的重要因素。对于流动儿童,民办小学的毕业生进入上海本地初中的概率显著低于公办学校的毕业生。这一差别与两类学校学生的考试成绩无关,完全是制度性的不平等导致。上海没有专门针对流动儿童的民办初中,而现有公办中学的学位不足,且优先录取对口公办小学的学生。因此,只有少量民办小学的学生在初中学位有剩余后才能进入上海的公办初中,而其余大部分需要返回原籍。返回老家的流动儿童要重新适应家乡的教材和新的学习环境,他们当中的许多孩子将从“流动儿童”转化为“留守儿童”。基于类似的原因,入读民办小学的流动儿童即使初中留在上海,也可能在初中阶段离开上海、返回老家。

入读民办学校除了在短期对流动儿童的认知和升学有影响,还有长期的影响,包括对流动儿童顺利升学高中的影响。

义务教育阶段入读民办学校的长期影响

教育部近期公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这无疑凸现了高中教育的极端重要性。高中教育不仅是继续升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步骤,并且本身也带来巨大的工资回报。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就业调查(CHES)数据的显示,最高学历为高中水平的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比最高学历仅为初中水平的劳动力的年平均工资高26%左右。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显示,是否接受高中教育对于犯罪行为和死亡率等都有显著影响。

根据笔者和合作者在上海进行的长期跟踪调查,我们发现,调查样本中98%的上海本地儿童能连续升学进入高中,但仅有80%左右的上海流动儿童能顺利进入高中,他们当中大部分辍学,少部分留级念初中。在流动儿童中,小学阶段就读民办学校的,相比较于公办学校毕业生按时顺利入读高中的可能性更低,更有可能辍学或留级。一方面,民办小学的教学质量较差,导致学生成绩更低,而学习成绩无疑是进一步升学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入读公办小学的流动儿童更可能继续留在上海念初中,从而增加了他们进入职业高中的概率。

政策建议

是否进入公办小学对流动儿童的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流动儿童的成绩、是否继续留在上海念初中,还影响他们顺利进入高中学习的可能性。而这最终影响的是这些儿童在未来的工资水平高低,身体健康程度,是否犯罪等,乃至整个国家公民的教育素质。

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涉及教育公平,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以及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流入地政府应当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加大公办学校向流动儿童开放的力度,包括优质公办学校。同时,民办学校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在目前公办学校资源不能满足所有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的情况下,仍有存在的必要。政府需要加大对民办学校扶持和监管的政策,并提升民办学校教学质量,破除公民办之间的制度壁垒。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澎湃】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刘诗濛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第七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与此前几次个税改革相比,新个税法改革力度大,涉及面广,切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性。个人所得税与每位公民息息相关,因此本次个税改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本文依据新个人所得税法,讨论目前中国实行的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的隐性区域不平等,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讨论贡献一份力量,为中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后续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本次个税改革主要内容

本次个税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收紧无住所居民个人判断标准。新税法第一条明确引入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概念。相比之前以无住所个人是否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年的判定标准,新税法183天的标准大幅收紧了居民个人的时间判定标准。同时,新税法也细分了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税收规定。

第二,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并优化税率结构。居民个人的四项劳动性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并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按月征税改为按年征税。同时,新税法适当简并了应税所得分类并适当调整了各档税率的级距。

第三,建立综合所得税前扣除机制,提高基本减除,增

加专项附加扣除。个人综合所得扣除项目不再保留专门的附加减除费用,而是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租金六大专项附加扣除。

第四,引入纳税人识别号,完善自行申报与扣缴申报机制,并增加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等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可以看到,新的个税制度更加合理与优化。然而在这些调整中,除了专项扣除中的住房租金扣除按地区分为三档,其余条款都是全国统一。绝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全国统一的税率税制,体现了公平性。然而在深入的经济思考下,事实并非如此。全国统一的税率税制恰恰会导致一种隐性的区域不平等。

统一税率的隐性区域不平等

在讨论个税制度的区域不平等之前,我们需要明白名义收入,真实收入与生活成本这几个概念与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名义收入就是公民所获得的所有账面收入的总和。假如一个人的收入只有工资性收入,那么这个人的名义收入即为他的工资。真实收入,则是名义收入的购买力或者能够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真实收入是剔除了各地生活成本与物价水平的差异之后的收入水平。

目前,中国的个税法是按照名义收入确定税率与税额,并且是全国统一使用同一个税率结构。这种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忽略了一个重要经济事实。那就是,在高收入地区,人们面临的生活成本往往也较高。例如,2017年,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988元(数据来源:2018中国统计年鉴),为全国最高;然而上海的生活成本指数为92(数据来源:《全球城市生活成本2017》调查),也为全国最高。因此,虽然上海的名义工资很高,但是由于同样很高的生活成本,与其它地区的生活水平差异可能并不如名义工资的差异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根据名义工资来确定税额存在着一种

隐性的不公平。举个例子, A 与 B 收入同为月工资 1 万元, A 生活在上海 B 生活在重庆, 两人应缴的个人所得税完全一样。然而由于生活成本的差异, B 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 A。两个生活水平完全不同的人却缴纳一样数额的个人所得税, 这就造成了一种隐性的区域不平等。

事实上, 这种隐性的区域不平等在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例如, 美国的联邦税也是依照全国统一的累计超额税率对全美各州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 经济学家真正意识到这一隐性的不平等现象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 David Albouy 在 2009 年的一篇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文章中 (The Unequal Geographic Burden of Federal Taxation) 首次提出了美国联邦税的隐性地区不平等并量化了其造成的经济与福利损失。

该文章认为, 美国实行的全国统一的联邦税降低了高生产力地区的长期就业率以及美国整体的生产效率, 导致了社会总福利的损失。该文章阐述到, 由于美国各城市的工资和生活成本差别较大, 平均名义工资较高的城市, 生活成本往往也较高。而美国的联邦税是依照名义工资计算税款的, 平均名义工资高的地区在有着与其余地区相同真实工资的情况下, 却要缴纳更多的税, 并且没有享受到更高的福利。这会导致城市间税收分配不平等, 使得大城市工资与房价相对下降, 劳动力由此流向平均名义工资较低的城市甚至是农村, 由此产生的就业地理分布效率低下, 总体上降低了社会福利。事实上, 在这种税收体系下, 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在补贴小城市的中产阶级, 而这并不是政府的初衷。依据一般均衡模型, 该文章估算得出, 这样的税收结构导致高工资地区的长期就业率降低了 13%, 土地和住房价格降低了 21% 和 5%, 整体损失的经济效率大约为每年 280 亿美元。

事实上, 在美国的税收体制中, 州税的存在以及各种基于当地生活成本的税收福利, 例如按揭利息扣除, 已经大大缓解了这一隐性的地区不公平。然而 David Albouy 在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之后依然发现如此大的地区不平等和福利损失。而在中国的个税体系中, 极少有这些基于当地生活成本的税收福利。在此次个税改革之后, 也仅仅在住房租金专项扣除上考虑了地区差异。可以想象, 在中国这种全国统一的个税体系下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效率与福利损失。

事实上, 在中国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有大量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大量的外地工人为

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 促使城市凭借人口红利不断发展。尤其是一线城市, 外来务工人数量是个十分庞大的数目。以上海为例, 2016 年上海常住人口为 2419.7 万人, 而户籍人口仅有 1450 万人 (数据来源: 2017 年上海统计年鉴)。而那些在高生活成本地区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 缴纳着比其他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 却无法享受与当地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福利, 例如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子女受教育机会等。这无疑会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的损失。

未来改革的方向

个人认为, 本次中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最大亮点无疑是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 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所得税的调整。并且, 本次改革后, 个人所得税制初步开始考虑区域差异, 即按照区域生活成本的差异实行住房租金扣除。这些改革, 体现了不同家庭纳税能力的差异, 更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实现地区公平化的良好开端。

个人所得税为政府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 保障了优质的公共服务, 并一定程度上通过财富再分配减少了社会不公平。然而正如本文所述, 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着隐性的地区不平等, 并带来了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那么未来的改革方向, 应该继续在保障公平和效率上努力。一方面, 个税征收与扣除标准可以更多地放权于地方政府, 使之能够针对当地实际情况, 将各项专项扣除标准细化活化。在教育支出、医疗支出、老人赡养费用、按揭利息等各个方面实行区域差异化对待, 充分考虑当地的物价水平与长期发展方向, 制定合理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专项扣除标准, 保障公平。另一方面, 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充分考虑税收的宏观经济调控作用, 加强基础设施与完整和谐法治法规的建设, 促进可见的经济发展, 关注中国各地区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协调发展, 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同时, 户籍制度的改革与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息息相关, 涉及到千千万万外出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 政府在后续的改革中要做到高瞻远瞩, 充分考虑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 制定出最合理而有效的改革方案。

注: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本科生曹美连为本文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前期工作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

【VoxChina】计划生育政策 如何改变我国老年人群的生活?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陈祎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方汉明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 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其中一个代表就是“晚、稀、少”政策。“晚”指结婚年龄, 女性不低于 23 岁, 男性不低于 25 岁; “稀”指生育间隔, 两胎之间不少于 3 年; “少”指孩子数, 建议每对夫妻最多两个。短短十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由 1969 年的 5.7% 迅速下降至 1978 年的 2.7%。四十年后的今天, 最早一批受该政策影响的人群已逐步迈入老年阶段。相较上一代人而言, 这一群体膝下能照顾他们的子女更少。尽管 2016 年 1 月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但此时众多家庭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 因此计划生育的影响将长期存在。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会对我国的老年群体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我们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RLS), 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老年群体 (60 岁及以上) 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诚然, 子女在赡养老人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少生”未必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其因有二: 一方面, “少生”使得父母能够把更多的资源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 “养儿防老”并不是养老的唯一手段, 父母也可能采取其它措施来应对养老问题, 例如增加储蓄等。

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照料的影响

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方式主要包括共同居住、经济赡养、陪伴与看护等。我们发现, 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照料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降低了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的

可能性 (住在同一村庄或社区的概率下降 8.8%, 同一区县的概率下降 7.6%); 第二, 子女赡养父母的转移支付下降约为 395.9 元 / 每年 (占样本均值的 18.6%); 第三, 子女联系、探望父母的频率分别减少 3.08 次 / 每月、3.00 次 / 每月。

和计划生育有关的一个著名理论是“数量—质量”的权衡取舍, 即当孩子数减少时, 孩子的平均质量会有所提高。那么这一权衡取舍会如何影响子女对父母的照料呢? 我们发现, 这需要区分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来看, 虽然“质量”较高的子女收入更高, 可以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 但由于那些子女一般住得更远, 工作也更忙, 探望父母的成本较高, 因此他们联系或探望父母的频率反而更低。

计划生育政策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在计划生育的影响下, 尽管父母从子女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有所减少, 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家庭总支出减少的证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可以通过增加储蓄为老年时期的消费提供资金保障。我们同时发现, 计划生育政策会影响家庭的支出结构, 人们会在衣食住行上会花更多的钱, 在有关健康方面的开销有所减少。

我们的核心发现之一, 是计划生育政策对父母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 计划生育对父母的身体健康或没有任何影响, 或影响略为积极; 另一方面, 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愈深, 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愈不容乐观, 尤其母亲或农村父母的抑郁症状表现更为严重。老人们更倾向于报告如下三种感受: “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感到孤独”、“感到不快乐”。我们推测缺少子女陪伴往往是造成抑郁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对父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不一? 我们发现, 两个因素部分抵消了“少生”对父母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第一, 在“数量”与“质量”的权衡下, 孩子数的降低会使得单个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 收入水平更高, 因而能够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 第二, “少生”使得父母在工作年龄期间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 以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但以上这两点并不能改善父母的心理健康, 在“晚、稀、少”政

策的影响下,不但子女总数会出现降低,同时因高教育、高收入的子女和父母的距离普遍更远,单个子女联系及探望父母的频率也更少。此外,钱是可以“攒”的,但子女的陪伴是无法积攒的。

计划生育政策的异质性效应与福利不平等

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不同的人群有怎样不同的影响?我们发现,由于“晚、稀、少”政策对所有家庭实施近乎一刀切的规则,政策前生育率较高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们发现,受此影响,这些家庭的消费增幅更大,但他们和子女同住或就近生活的可能性也降低得更多,母亲报告抑郁症状的概率上升得也更多。

我们认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例如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往往

会生养更多的孩子,而这些相对“脆弱”的家庭也往往难以应对外部的生活危机。然而,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生育限制,对这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产生了更大影响。因而,计划生育可能会给社会福利不平等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结论与建议

我们以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为例,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评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或无影响,或有轻微的积极影响;但受政策影响较大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考虑到中国当前的老年自杀率是世界平均老年自杀率的 2 倍之多,是我国人口整体自杀率的 4-5 倍,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应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同时要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类型家庭的异质性影响,政府需优先出台相关政策以应对这一情况。

本文转载自 VoxChina



清晨散步的老年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财新网】女性公平就业难，职场离性别真正平等还有多远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杨哲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妇联界委员联名提案,应当出台促进女性公平就业激励政策,女性就业影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早在 2 月 21 日,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要求各类用人单位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聘信息、招聘人员过程中,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目的是为了禁止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平等就业。这一规定的出台,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不少人担心,这些规定不仅不能给女性带来真正的职场优惠,反而会对进一步给减少女性的就业机会。用人单位了解女性求职者婚育情况的动机是什么?招聘不得询问女性婚育究竟会产生哪些效果?男女职场平等的真正障碍是什么?如何从根本上促进男女职场平等?本文根据我国妇女的家庭和就业的实际情况,并应用国际前沿的劳动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理论,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了解女性婚育情况的动机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盈利,需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招到绩效尽可能高的员工。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在产假期间不能为企业创造绩效。同时,产后的育儿任务也会使女性业绩受限。所以企业在招聘时要想判断一名女性的未来业绩,就会考虑其近期的生育概率。尤其是在行业竞争激烈、员工流动性高的小企业,如果遇到几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完产假就离职的情况,将对企业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类企业在招人的过程中,避开已婚但尚未生育的女性是一种理性选择。反过来,在流动性低、不以盈利为导向,或者所处行业以公有制为主导、市场竞争不激烈的单位,女性生育期间绩效受限的问题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因此这类企业在招聘时了解女性婚育情况的动机相对来说较弱。

强制规定用人单位不准在招聘过程中了解女性婚育情况的可能效果

不同类型的单位,强制规定不准了解女性婚育情况的效果会有很大差别。在国家机关单位,招聘时避开育龄已婚无孩女性的动机相对较弱,因此规定带来的额外限制并不大,预计将会相对顺利地带头执行规定。而在大多数私营小企业,基于降低成本、利润最大化考虑,会在招聘时想尽一切办法,以明面上不违反规定的间接方式了解女求职者的婚育情况。同时,即使企业不主动打探,女性求职者出于对企业需求的认知,会争相主动展示自己在婚育情况方面相对于其他人的优势。无论哪种情况,企业都会得知求职者的婚育状况。因此,即使是在原本对已婚未育女性不友好的企业中,强制规定的预计效果也不大。

以上分析都基于“实际情况企业总有办法绕开规定”的假设。要是把绕开的路都完美地堵上,彻底断绝企业获得女求职者婚育状况信息的渠道,会有什么后果呢?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企业完全无法区分婚育状态,只能“盲招”的情况下,会把各种婚育情况的预测绩效混合在一起开出平均待遇。这样的结果是,原本有机会展示“有竞争力”的婚育状况的职场女性将因此而受到统计性歧视。对她们来说,这个新的“大锅饭”不如原本能争取到的待遇,她们当中的一部分因此会退出。然而,退出的这部分人恰恰是企业最想要的人,导致剩下的女性求职者中能给企业带来风险的已婚育龄无孩的女性比例增加,从而进一步压低企业对女性的混合预测绩效以及平均待遇。由此将形成一个对企业来说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当企业给女性的待遇降到比男性低很多,且引起争议而没法继续降低时,就会干脆不招聘女性。最后形成一个对职场女性更加糟糕的局面。

类似的以公平就业为目的而设计的规定产生适得其反效果的例子在美国曾有先例。Jennifer L. Doleac 和 Benjamin Hansen 在 2016 年发表于 NBER 的工作论文使用 CPS 数据在实证上提供了参考。这篇研究的对象是美国最近二十年来在各州陆续推行的一项致力于促进有犯罪

前科的人重新就业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不得询问犯罪记录,以求在职场上给改过自新的前服刑人员一条活路。但是研究结果显示,这项法案给全体上过大学的年轻黑人找工作造成了障碍,导致这些人的平均就业比例降低了3.4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很多雇主努力通过其它方式搜索到了求职者以前的服刑情况,还有很多雇主干脆就不雇佣黑人了,给守法的黑人带来严重的统计性歧视。犯罪记录和婚育状况固然有着天壤之别,但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引起的由信息不对称到统计性歧视的机制是相通的。

男女职场不平等的根源

经济学界对男女工资、就业不平等的解释有很多种,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人力资本、制度观念以及由女性生育后代方面的禀赋导致的家庭内部按比较优势分工。

首先,在体力劳动占主导的年代,男性人力资本通常高于女性。无论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工业化的早期,大部分工作对体力都有较高的要求。在这些社会阶段,男性相对于女性具有先天的经济优势。借助长期的经济优势,男性主导了上层社会,造成女性通过自身技能提升社会地位的回报率很低,形成了在后天人力资本投入方面重男轻女的局面。这些投入不仅包括营养、识字、上学,还包括在竞争意识、风险偏好等个性的形成,工作经验的获取、人际网络的建立等方面。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脑力劳动和人际沟通慢慢取代体力劳动,男性的先天优势在逐渐弱化。同时,女性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率,包括通过找工作和找对象两个方面,都随着选择面的拓宽而上升。再加上在校学习期间女孩相比于男孩有非认知能力方面的优势,男女教育程度差异正在逐渐缩小,甚至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逆转。考虑到上述因素,个人认为男女在人力资本上的不平等,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都正在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缩小,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其次,制度和观念也是造成男女就业不平等的因素之一。制度方面,Goldin和Rouse于2000年在他们发表于AER的研究中发现,在乐团选拔过程中如果用幕布将演奏者和裁判隔开,不让双方互相看到对方的性别,这一制度使得女选手入围的成功率提高50%。性别观念方面,Bertrand,Kamenica,Pan于2015年发表于QJE上的一篇研究使用美国人口普查1970-2000年的数据显示,夫妻收入比的分布在1:1处存在跳跃。为了避免出现在收入上出现“阴盛阳衰”这一不符合传统观念的情况,当妻子的潜在收入大于丈夫的潜在收入时,妻子会刻意让自己的实

际收入低于潜在收入。尽管如此,无论是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还是国内的CFPS数据都显示,“男主内,女主外”的比例在逐年攀升。个人认为,这个趋势印证了性别观念作为上层建筑,会自然跟随经济基础的方向变化。一旦有了男女平等的经济基础,观念的转变将会水到渠成。因此性别观念的滞后并非解决男女平等问题的难点。

最后是生育问题以及男女双方按照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即使男女在职场上的能力完全相同,但由于女方更能胜任照顾小孩(更不用说生产小孩的能力),为了提高家庭合作的效率,女方会承担更多照顾小孩的任务,减少在职场上投入的精力。雇主出于对这一原理的认知,会默认即使男女双方在相同的岗位工作,工作时间相同,男方比女方在工作上也更卖力。例如遇到小孩生病的时候,女方比男方更容易从工作中分心。这种男女角色分工是由生理差异决定的,无法通过技术进步和政策抹平,是最难解决的男女不公平。

未来促进男女职场平等的一点建议

个人认为,现阶段解决男女职场不平等的问题,关键在于减少企业雇佣女职工的风险。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让企业愿意招聘女员工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政府提供保障,让企业雇佣女性变得有利可图,或者至少不成为负担,不亏钱。相比于招男性,企业招女性最担心什么?入职休产假,生完孩子就离职。只有帮企业抹平这种风险,才能消除招聘女性的顾虑。具体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是在事前减轻风险。例如美国,要求50人以上的企业为入职一年以上的员工提供三个月的产假,但在国家层面不对带薪产假做任何要求。尽管各州有额外的关于产假长度和薪水的规定,有的大公司甚至还提供更诱人的带薪产假福利来吸引人才,但总体来看,在长度上比我国现行的产假要短,产假期间相对工资标准比我们要低,且设有少量的工龄门槛。相比于薪水,我国企业更难承受的产假成本是缺岗和入职不久就请产假。尤其是对很多重要的岗位,半年空缺显得过长。针对这两点,个人建议可以把产假时间设置得更灵活些,减少全休的时间,增加半休的时间。总长度还可以和工龄相关:刚入职的给短点,入职久的奖励长点,以求在总体产假福利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减少企业的风险和负担。第二种思路是在事后适当补偿企业的损失,例如给休产假的女员工所在企业减税。总之,只有让女性的生育不再成为企业的包袱,企业才会放心去招女职工,男女职场平等才能真正实现。

本文转载自财新网观点频道

【南方+】我院张思思、史炜老师解读“住宅应以套内面积交易”政策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近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开征求意见的《住宅项目规范》8项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工程规范,引发社会对“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的话题广泛讨论。我院副教授张思思和史炜接受“南方+”记者采访时分别进行解读。张思思认为,推行销售房屋按套内面积计算的政策,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及与国际接轨,对房价亦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史炜认为,此政策有望使得住宅的使用成本更透明,规范交易行为、减少因公摊面积产生的纠纷。以下为“南方+”报道摘编。

张思思:保护消费者权益与国际接轨,对房价或影响不大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思思认为,推行销售房屋按套内面积计算的政策,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及与国际接轨,对房价亦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该做法能有效地减少房地产交易的纠纷,减少开发商“偷面积”的不正当行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公摊面积的计算缺乏统一的标准,在测量上也不具有独立性。比如之前少数开发商会把独立使用的地下室、车库,法律明文规定不算公摊的为多栋服务的警卫室、管理用房等都计入公摊面积中,购房者很难察觉。

销售房屋按套内面积销售是国际通行惯例,在国内也有少数城市已开始执行。比如重庆自2002年起已执行按套内面积计价。顺德自2014年起采用建筑面积、套内面积

计价“双轨并行”的方式。我国现有的计价模式源于香港,但香港也已在2013年取消了公摊面积的算法,按实用面积计价。

张思思认为,就算出台销售房屋按套内面积的政策,也不会导致房价的大幅波动,因为住房供给和需求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由于计价方式的变化导致每平方米单价的突然上涨有可能影响部分购房者的心理,觉得房子更贵,短期内延迟买房的决策。

此外,在《住宅项目规范》中提出新建住宅要全装修交付,这项政策可能会对房价有一定的影响。毛坯房的供给减少,精装房供给增多。全装修对购房者来说固然更加便利,但装修质量等不可控的因素增加,减少了个性化的空间。

史炜:以按套内使用面积计算为契机,明晰公共区域的权属

每一个销售房屋都有或多或少属产权人共有的区域,即公摊面积,比如电梯、楼道、公共门厅、设备间等。当前除个别城市外,房屋买卖是按建筑面积计算单价,再依据分摊系数得到每套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由于不同房型、楼高的小区的分摊系数一般不同,再加上分摊系数一般不会显著地出现在房屋销售的广告中,导致按建筑面积计算的单价不能直接与实际使用面积的单价相对应。史炜认为,此政策有望使得住宅的使用成本更透明,规范交易行为、减少因公摊面积产生的纠纷。

公摊面积虽然不在个人房屋内,但这些公共区域的功能与每个业主都相关。宽敞的门厅、充足的电梯等配套设施可以提高居住品质。随着社会老龄化,一些不可或缺的无障碍设施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公摊面积。这些公共区域的配置不只是居民购房时要考虑的附带成本,本身也是居住品质的决定因素之一,也不应弱化。希望政策鼓励房屋卖家明确公共区域及配套设施的权属,比如是属于全楼业主还是部分业主共享,以保护购房者的权益。

报道来源:南方+

记者:冯善书

发布时间:2019-02-24

【新华社】

李书娟：中小学家委会该怎样管？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者按：

近日，中小学家委会的一些做法，如利用班费宴请教师、帮助学校强制征订校服等引发社会关注。新华社就家委会的运作方式、管理监督等问题采访了该院助理教授李书娟。以下为报道原文：

主动作为却频引争议，中小学家委会该管些啥？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记者刘洪明、郑天虹、谭畅）利用班费宴请教师、帮助学校强制征订校服……中小学家长委员会的一些主动作为，引发网友热议。中小学家委会应发挥什么作用？管些什么事情？自身如何管理？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家委会部分做法惹争议

今年年初，网曝“湖南省郴州市二中高569班家委会家长用班费违规宴请六名教师，并赠送红包”引发热议。记者从郴州市苏仙区委宣传部获悉，经苏仙区教育局调查，该校六名教师违规接受宴请并收受红包情况属实，责成郴州市二中对六名教师作出处理。

事件发生后，有网友认为，这不仅与教师有关，也与该班家委会脱不开关系。

据湖南省纪委省监委2018年11月通报，长沙县麻林中学八、九年级违规征订教辅材料问题，也有家委会的身影。2017年12月，部分学生家长利用家委会在外联系书商，购买某系列教辅材料，供学生使用，且任课教师使用该套教辅布置作业并批阅。2018年4月，麻林中学自查发现问题后，未有效制止和上报情况。2018年8月，该校校长冯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教导主任潘奇志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家委会有关的类似事件，其他地方也时有所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家委会该管些啥？

教育部2012年出台《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对家委会的基本职责作了明确：家委会应在学校的指导下履行职责，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2015年10月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中小学幼儿园要将家委会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制订家长委员会章程，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作为重要任务。”

教育部鼓励成立家委会的初衷，是发挥好家委会家校沟通“纽带”的作用。可事实上，一些学校极少对家委会的组成、管理等作出详细规定。“参与教育工作”“沟通

学校与家庭”等职责并无明确规定，导致一些学校的家委会违背家长意愿组织活动，甚至盲目违规参与教育教学。

广州一名小学班主任告诉记者，家委会一般由高素质的热心家长组成，在学校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参与学校校服的设计、依托自己的职业优势进校给孩子们做一些生理心理健康、运动营养、职业认知等内容的讲座，特别是帮助学校传达一些正确的教育理念。记者在广东、山东等地采访了解到，学校基本配齐家委会，但家委会效能发挥参差不齐。

广州一位家长对家委会吐槽：其实我们也希望家委会能向校方反映家长的心声，但是感觉家委会“下达”的作用多，“上传”的作用少。“比如我们要求家委会跟校方反映问题，但是家委会却说怕得罪校方，一直不反映广大家长的呼声。”

对家委会如何选人，近年来，有的学校采取竞选方式，有些是家长推荐。还有家长反映，一些家长参加家委会是为了获得更多话语权，或让自家孩子受到优待，进而将竞选家委会成员演变为“名利秀”，令人大跌眼镜。

家委会该怎样管？

近两年，多地重视并完善家委会工作职责。如北京2018年9月出台意见，将家长委员会纳入学校日常管理，

制定家长委员会章程，提及建好家长委员会，成立校级、年级、班级三级家长委员会。广东、山东等省份也出台了相关规定。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各个区县教育部门和学校有必要因地制宜制定更加详细的家委会规章制度，确保具体化、透明化、可操作。

近年来，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积极开展家校共建教育探索，通过家委会这一有效载体，推动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区、家庭与社区之间实现良好互动，努力形成了教师、学生、家长三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本部校区教育处主任张白白认为，完善的制度是保证工作正常运转的关键。

2019年1月，湖北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在湖北省两会期间，建言将家委会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定期听取家委会反馈的意见建议，合理改进教育教学工作。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书娟说：“成为家委会成员一般遵循自愿原则，家委会对学校教育起到了很大协助作用，避免了许多重复的沟通与劳动。”李书娟认为，家委会的职责是为家长和学生服务，鉴于现在一些地方家委会出现的行为失范问题，教育部门要加强教师行为规范，同时让家委会工作更加公开透明。

报道来源：新华社中国网事

发布时间：2019-02-18



某中学家委会结束（图片来源于网络）

“规范细化”与“严格监管” 合力规范社交电商发展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张毅

2017年至今,零售行业最火爆的变化就是社交电商的出现。社交电商是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随着201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正式实施,为更好地监管社交电商提供了可能,进一步强调了经营者的举证责任,使得大流量监管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根据国家《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结合地方电子商务和经济发展情况,强化市场的主导作用,鼓励社交网络发挥内容、创意及用户关系优势,建立健康规范的社交电商发展模式,实现电子商务产业链共治共建共享的健康生态。为了推动社交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2018年9月份商务部拟定了《社交电商经营规范》(以下统称规范)。此规范旨在社交电商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建立健康发展的经营准则,推动社交电商的可持续发展。规范当中有几点亮点对于社交电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规范意见。此文想简单的讨论一下在社交电商的快速发展当中,社交网络所发挥的作用,社交电商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及规范针对这些问题的几大亮点。

社交网络的飞速发展促进了社交电商的发展

1. 社交网络的强粘性、强社交特点对于降低社交电商的营销成本起到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人们对于移动社交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微信,QQ,微博等新型的移动互联网社交模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变得简单快捷。如今,社交网络最突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使用人群广泛,具有很强的客户使用粘性。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消费者每天都有使用微信,QQ,微博等APP的习惯。第二是使用频率高,消费者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些社交应用变得更加频繁,使得消费者之间的社交关系更紧密更强。社交网络的结构因此变的更为复杂。社交网络当中,当某个消费者基于自身需求(或者折扣价格的吸引)对特定的拼团产品进行搜索与转发,社交网络的强粘性、强社交属性使得转发更快更准确地找到了具有相同需求(或者相同的被价格吸引)的消费者加入。由于每个消费者的需求都不相同,特定的拼团信息会被不同的人转发,这意味着信息进入社

交网络的入口就不相同。与传统的营销模式(如广告,推送等)相比,这样的模式增加了流量,因为每个消费者都可以成为流量入口,以往社交电商用于获取流量的营销成本被降低。综上所述,社交网络的强粘性,强社交特点对社交电商营销成本控制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社交网络的群聚特点对于社交电商的拼团转化率起到促进的作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交网络展现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群聚的特点。例如,部分拥有相似目的消费者会组成微信群、QQ群又或者具有同样兴趣关注同样账号的用户形成的群。通常来说群聚的消费者会有相似的需求与话题。在庞大的社交网络当中,需求与话题相似的消费会聚集起来,这样群聚当中的消费者具有相似的消费需求,且每个人都可能关注同样的拼单(或者团购)信息,因此拼单(或者团购)在群聚当中的转化率相对较高,这样的高转化率使得社交电商拼单成功率大大的提高。

综上所述,社交网络的显著特征为拼团大流量以及高转化率提供了可能。倚仗社交网络的这些特点,社交电商在过去几年以社交网络为依托迅速扩张。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社交电商得到了众多资本的青睐,资本的注入加速了社交电商在过去三年飞速的发展,然而社交电商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带来的一些问题。

重新审视飞速发展的社交电商

问题一:部分平台存在不规范的经营模式。许多社交电商为了扩张,采取鼓励发展团队,推出奖励招募、返利等策略鼓励大家对相关的拼团促销信息进行转发。然而近年来已经曝光多起社交电商采用会员制、线下返利等带有传销嫌疑的营销模式。虽然转发是个人行为,但是鉴于每个消费者需求不完全相同,拼团的信息被过度转发,频繁刷屏。这导致社交网络的平台上充斥大量重复信息,同时也容易导致营销变成违法传销。

问题二:部分商品的质量无法保证。社交电商拼团的部分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正如早些年传统电商经历的假货风波一样,社交电商作为新兴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存在着同样

的问题。如何保证所销售商品的质量也是社交电商面临的一大挑战。虽然拼团信息可以迅速被转发,找到相同需求的人一起加入完成拼团,但是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那么影响的消费者将是拼团里的所有成员。由于每个消费者的鉴别能力不完全相同,商品也没有明显标识帮助消费者识别产品,通过社交网络传播的拼团信息可能包含大量质量无法保证的商品。侵权假冒品牌商品等问题在目前的社交电商平台上也普遍存在,2018年8月拼多多就曾经被工商部门约谈要求对商品的质量问题进行严格的把控,保护消费者权益。

问题三:消费者群体价格敏感度高,可能造成社交电商恶性竞争。社交电商另一个特点是产品价格相对较低。许多社交电商采用拼团功能,购买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产品价格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折扣。虽然消费者对于社交网络有强粘性,但是对于社交电商平台本身不存在强粘性。消费者通常可以是同时使用多个社交电商平台,因此消费者可以对多个社交电商平台上的类似产品进行比较,选择拼团最低价格同类商品所在的社交电商进行购买。社交电商平台为了锁定流量可能导致社交平台之间出现恶性竞争。



网友晒出了在某社交电商平台购买的某山寨名牌商品(图片来自网络)

“规范细化”与“严格监管” 是政府强有力的手

2018年9月,商务部推出的《社交电商经营规范》当中充分考虑了社交电商可能存在的不规范行为并制定了相关条款,对社交电商的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规范明确了社交电商的具体经营范围,严禁社交电商进行传销与非法集资。规范对于社交电商的营销模式做出了具体要求,明令禁止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

其次,规范制定了商品信息广告内容的标准,尤其要强调的是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明确了消费者转发任何拼团广告的情况下,广告发布者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规范充分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对社交电商售后服务的监督与如何保障消费者权益做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社交电商对消费者的侵权责任划分。

最后,规范明确了市场当中社交电商之间应当公平竞争。这部分规范当中值得一提的是社交电商经营者、社交电商平台及社交电商服务商不得对其商品或恶意对不同平台的用户评价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细化到用户评价是考虑的非常全面的,当下大家使用手机APP时习惯性的阅读用户评价来作为参考,此规则对刷评价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此外,社交电商经营者、社交电商平台及社交电商服务商不得未经其他社交电商主体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社交电商主体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避免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

但是,上述规范还需进一步细化,监管力度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

1. 规范的部分条款还可以进一步细化。规范更多发挥了指导作用,但是许多条款还有细化空间从而进一步的规范社交电商行业。例如,规范提出了严禁传销,但是没有进一步细化规定。社交电商可能发生的传销模式存在一些固定的特点,结合了社交网络的线上传销模式也完全有别于传统传销。应当针对社交电商当中特定的传销风险行为进行进一步的规范,这样不仅可以更好规范市场行为,也可以使得监管部门执行监管时的界限更加清晰。

2. 基于规范的监管还需要进一步跟进。规范指导下,还需要大力监管才能保证社交电商行业朝着健康、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下去。商品多、流量大使得监管机构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为更好地监管社交电商提供了可能,进一步强调了经营者的举证责任,使得大流量监管难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与此同时,监管的手段也需要进一步的创新。除了针对社交电商平台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约束,也可以对社交电商在社交网络平台发布的内容进行规范,使得信息源头在进入社交网络裂变之前被规范约束。监管部门可以与社交网络平台进行配合,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的信息筛选来对社交电商平台的行为进行抽查从而达到监管的目的。

我们期待未来“规范细化”与“严格监管”能形成合力建立健康规范的社交电商发展模式。“规范”下的社交电商平台会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结合好现阶段社交网络的优势,不断地为新兴的共享经济助力,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新动力。

本文首发自 IESR 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019年1月3日文章

李书娟：供需不平衡导致中小学校外培训热，教育招考制度改革是根本解决途径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政策研究轨） 李书娟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今年，教育部、国务院先后发文整治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学生学业负担重，家长焦虑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培训机构涨价的情况也很明显。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培训机构的定价是否合理？如何从根本上治理培训过热？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李书娟的分析如下。

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为什么学生学业负担依然重、家长依然焦虑？

2018年年初，四部委联合下发整治校外培训机构通知，经过各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分阶段专项治理（排查摸底阶段-集中整改阶段-专项督促和检查阶段），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其成效主要体现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经营及服务质量上。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查出存在问题机构272842所，完成整改211225所。对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整治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校外培训的质量，具体体现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设立、经营及培训内容的限制等方面，提高校外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规范其设立流程，提高硬件及软件设施要求。上述措施对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经营活动、提高培训质量确实是有利的。

但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并不能根本解决学生学业负担重、家长焦虑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在目前的升学制度下，

中小學生普遍面临的升学压力。巨大的升学压力导致学生对课业辅导的需求陡增，而这一需求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的培训机构。学生对于校外辅导的需求来源于“小升初”、“初升高”甚至幼小衔接的压力。一方面，各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许多学校尤其是教育资源好的学校仍然采取“掐尖”的方式招取学生，而且学习成绩仍然是最主要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家长普遍希望子女能够进入教育资源好的学校就读，因此会想方设法提高子女学习成绩的竞争力。校外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几乎成为了家长们期望提高子女学习成绩的唯一方式。因此，只要现有的以考试成绩为衡量标准的人才选拔方式没有变化，学生对于校外辅导的需求就仍然大量存在，学生的学业负担就会依然沉重，家长也会焦虑依旧。



某地“小升初”电脑派位 家长学生看榜场面失控 (图片来自中新网)

当前培训机构涨价的情况也很明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培训机构的定价是否合理？

经过大范围的严格整治后，校外培训机构涨价符合一般经济规律，需求没变，供给减少了，价格自然提高。一方面，学生面临的升学压力依旧，对校外辅导的需求仍然很大。以广州为例，据广州市教育局局长樊群介绍，广州在2018年5月份摸排校外培训机构6000余所，排查中小学校1200多所，统计参加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近26万人。按照《2016广州市教育统计手册》数据，中小学

在校生数量147万计，每5到6位中小學生中就有1位正在上校外培训班；另一方面，培训机构经过整治后，不少培训机构面临整改不能营业，而新培训机构进入门槛又提高了，导致市场上提供的培训服务减少。根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这意味着校外培训的需求没变，但供给减少了，价格自然就上涨。

关于培训机构的定价是否合理，尽管现有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价格，但显然也是存在扭曲的价格。根据现在的市场行情来说，从家庭负担的角度，培训机构费用对大部分家庭都形成了负担，不仅是经济负担，时间成本也很高。培训机构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只是培训市场仍然需要更规范化，引入更多的良性竞争以及服务方式多样化。在此，也进一步呼吁国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

如何从根本上治理培训过热？

培训热的根源主要在于对培训的需求巨大，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治理培训过热，还是得从减少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入手，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升学制度及人才评价标准的制度设计上。具体地，一方面，应当尽量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不平衡问题，正是因为学校存在优劣之分，大家才想尽办法进入教育资源好的学校，参加校外培训就是主要手段。另一方面，教育的本质是培育健全人格，培养创新型人才。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身心健康及创造能力远比琐碎的知识重要得多。回归教育本质，需要家长、学校、企业甚至国家在教育的最根本理念上达成共识。

高质量的发展依赖于创新驱动，创新只有可能来源于人才，更高质量的教育水平、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才能培养出更具创新精神的人才。回归教育本质，为孩子铺就更广阔的人生路，将给家庭带来更多获得感，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本文首发自IESR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019年1月9日文章



某培训机构外，家长们正在送孩子去上课 (图片来自网络)

杨尚铭：网络购物平台对“市场”的革新及其未来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杨尚铭

自亚当斯密的划时代巨著《国富论》问世，分工与交换是市场经济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径的观点已深入人心。观察历史，交换都会有特定的“市场”，常见的载体包括城市、村镇等。为何交换一定要有“市场”呢？

在没有货币之前，交换一方须找到自己需要的交换物品，如果有一个市场，大家都来这里交换，那么搜寻成本会大大降低。不过，有了货币之后，每个人都和货币交换就可以，或换来货币，或使用货币买。甲可以使用货币去买乙的东西，也可以卖自己的东西给丙，两两之间的交换可以不用在一个地点，为什么还需要市场？当然，这里面仍然有搜寻成本和货比三家的原因。设若交换一方对自己需求的货物的地点分布和质量都了然于胸（在人口流动非常低的时代，长时间的生活经历近乎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还需要市场吗？答案是仍然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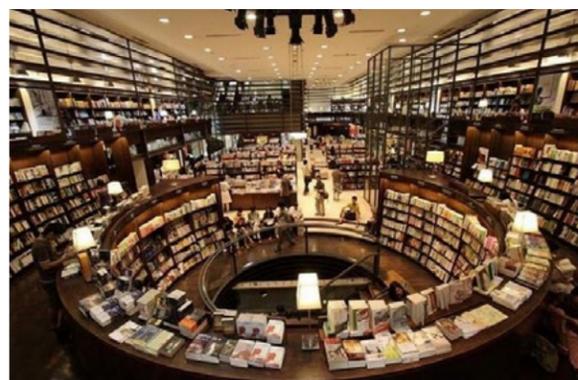
这里面的秘密，在于交通和运输成本。甲需要一样东西到地点A买来，需要另一样东西到地点B买来，甲所需的东西，不会都在一个地方，这就导致了巨大的运输成本。假若甲能到一个地方一次购得很多东西，那么交通和运输成本得以在物品之上平摊。以上假设买者走动，假设是卖者担负交通运输成本，卖者乙卖一件东西给丙在地点C，卖另一件东西给丁在地点D，同样也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如果乙能于同一地点一次卖给两个人，那么交运成本就可以平摊在两件物品上。从这个假想的例子里我们看到，有形市场的出现，是为了克服巨大的交通运输成本。

在中国的乡村，不少地方还存在着“赶集”一说。一个较大的村子，一年里会规定具体的日子有所谓的“赶集”。在规定的这天，不少卖小商品的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在乡村的主要道路上摆摊卖货，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还是人多点儿的村子，一年才有几天“赶集”，人少点儿的村子根本没有，只好到附近的村子去“蹭集”。但是在大城市，则近乎每天都在“赶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案在于需求的众寡。要卖者运商品到市场，是有运

输成本的，但是如果市场卖掉的货物足够多，就可以分摊运输成本到全部卖掉的商品上。小村子需求太小，不值得前往；大村子一年总需要很多东西，集中到那几天，可以卖不少；大城市则时刻都有不小的需求，几乎总能分摊运输成本至总成本的很小份额。因此，只有足够大的需求才可以克服运输货物所需的巨大成本。

以上所论述的买者与卖者相互倾向于聚在一起，则形成了市场。在有电商之前，市场是有形市场，交换在特定的地方（城市）发生（注：这里只针对商品，不涉及股票等虚拟资产）。但“市场”不是没有成本的，这便是我们现在称的“城市病”，诸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以前，都是货物先运输到城市的市场——商场，购买者去商场购物。这确实节省了上面论述的运输成本，但是占用的却是城市的“位置”资源。这“位置”资源相当宝贵，反映在商场昂贵的租金上。至于为什么“位置”这么宝贵，这涉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集聚经济，这里不详细论述。



台北敦南诚品书店即将在2020年关闭

有了电商之后，市场成为“虚拟”的网络平台。买卖通过虚拟的平台建立连接，则不需要占用城市宝贵的“位置”资源，而且如果是厂商直接发货至买家，则又是交通费用的节省。电商的巨大成功之下，实体店如商铺和书店

都遭受巨大冲击，有人惋惜。不过在我看来，电商为城市节省了昂贵的“位置”资源。这里不仅包括商场，连“生产工厂”也可以搬离城市。

但是电商的兴起，也是十几年才发展起来的。2003年淘宝即创立，我网上买到的东西，质量还比较次。这也是众多网络经济发展初期都会遇到的问题：买卖双方不再是经常接触可以找得到人的，如何让交易双方相信对方？淘宝现在有信用打分，但信用都是很多交易积累起来的，建立初期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很难在交易双方建立信任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其他网络经济，如滴滴在初期都要烧钱吸引交易双方，这些补贴一部分是对早期交易者面对风险的补偿。当平台上交易者和积累的交易次数很多的时候，一方面有信用打分；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也会迫使卖方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因此，电商发展初期是比较难的，但是一旦用户成规模，又会对潜在竞争者形成巨大的进入壁垒。

当前电商发展还是有不少潜力，这与其遇到的困难有关。其一是产品范围。有不少商品，是需要消费者“体验”后才能决定是否合适的。比如衣服鞋子需要试穿，很多网上购物因大小不合适而退换。由此产生了线下体验店。而VR黑科技的出现也为电商克服这一瓶颈指出了新的方向。



VR体验店（图片来自网络）

其二是地理辐射范围。前已论述，交易的达成需要足够大的需求来弥补产生的运输成本。因此发达的交通网络对电商来说至关重要，所幸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超前，因此电商在我国的兴起和成功，很大程度上需要归功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迅速完善。值得指出的是，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运输费用较高，一个居住区如果有足够多的需求是可以摊薄这最后一公里的运输成本的。但是需求稀少的地方，目前物流公司在尝试运输机器人或无人飞机。对于乡

村地区，则只能设置一些固定集散点投递一些等待成本较低的物品。



农村淘宝可以让农村人民享受到网购的便捷

电商还有一个潜力巨大的前景，即其精细的差异化产品。如果一个地方市场足够大，即使对于某个极不起眼的个人的需求，在总体市场上也会有巨量存在，因此我们能在淘宝上看到各式各样的产品，只要能想象得到的，几乎都有，这是我国巨量人口带来的规模经济，已经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的效用。差异化产品的极限则是个人定制。说起来人类生产的发展真是像黑格尔所谓的“在螺旋中前进”。福特汽车引进的标准化生产流程，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维修效率，但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不匹配的。举例来说，市面上的衣服，有1.70m的有1.75m的，但是一个人1.73m，则只能“将就”或长或短的。这只是一个维度，其他还有肩宽胸围腰围等等区别。我曾在微信上看到过一个朋友分享的黑科技，一排排巨大的生产车，人们穿上特制的衣服站进去，3D扫描就能得知这个人的形体数据，衣服马上就可以在车里生产出来。未来可以想象的是，一个消费者可以通过某种APP输入自己需要的产品特征（即DIY），将该特征通过电商平台传输给生产者，生产者可以精确地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果能如此，则人类生产又要从标准化演进“回”差异化。不过是更有效率了，借助的当然是科技。

一个创新勃发的时代正在上演，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首发自 IESR 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019年1月15日文章

崔潇濛：用气象大数据支持农业发展需要“上天下地”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崔潇濛



(图片来自网络)

前不久，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正式发布。从2004年开始，中央已经连续16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而言，每年的一号文件既是对现阶段工作所做的全面总结，也是对下一阶段工作所提出的全新要求。笔者注意到，今年一号文件在关于农业基础与农产品供给方面的讨论中提出要“建设现代气象为农服务体系”。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的一号文件，中央每年都对气象工作提出过具体的要求。总体来看，文件中一方面是强调加强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另一方面是提出加大对先进科技的利用以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气象为农服务体系”这个概念实际上在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已经提出了。当时“三农”领域新的政策焦点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那份一号文件中还特别强调要“发展智慧气象和农业遥感技术应用”，把推进气象领域前沿技术的应用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与2016年相比，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在“气象为农服务体系”这个提法前面又加了“现代”两个字。如何理解现代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现代”这两个字在这里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建设这样一个服务体系又需要开展哪些特殊的工作？

气象为农服务的核心是提高产量

从根本上来说，由于农业靠天吃饭的特点，建设气象为农服务体系是为了帮助农业生产者，尤其是种植业生产者提高“趋利避害”的能力，而能力的提升最终会反映在产量提高上。早期的气象工作部署对“避害”的强调更多一些，对“趋利”的重视则相对不足。“避害”具体体现在防灾减灾上，而“趋利”的具体体现则是通过有效利用气象信息和气象资源来提高农业生产中对水土、光照、热量等要素的综合利用效率。

随着农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大量的作物模型已经非常完善。经过严谨的实验和精细的测算，这些作物模型能够刻画每种作物的生长与其所需环境资源之间的函数关系。它会告诉生产者白天气温和夜晚气温会分别以何种形式影响作物生长，一种作物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中对水、热需求和敏感程度有什么样的区别，如何通过调节灌溉的频率和水量以平衡作物的蒸腾蒸发损失……

通过将气象信息和作物农学知识结合起来，生产者便可以通过动态优化种植行为来提高作物产量。当然，这同时也为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为以小农户为代表的基层生产者提供气象与农学知识和技术服务，是气象为农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之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地方气象部门与农业、民政、水利、国土等多部门开展合作，建立起气象为农直通服务的专门平台和网络。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以当地的农业大户、涉农企业和农业合作社为抓手，把气象信息指导下的优化种植方案传递给基层农民。

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通过气象工作“趋利”还可以体现在动态优化作物优势生长区的规划上。已有研究指出，我国气候变化的形势导致东北积温带不断北移，在过去十几年间已使得冬小麦的种植北界由长城沿线向北扩展了一两百公里。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气象分析和研究工作，指导目前正在进行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并进一步形成“两区”划定的动态机制。科学地把重要的农产品布局到更适宜其生长的区域，也应该成为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机器学习”开展气象大数据分析

现代气象为农服务体系中的“现代”二字主要体现在对前沿科技的应用方面。从前面的讨论不难看出，气象服务农业的基础是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气象数据信息。然而，想获得真正有价值的气象数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国气象公司(The Climate Corp.)是一家在2006年成立于旧金山的数字农业科技。该公司天气科学部门主管Brad Colman曾谈到，通过雷达虽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哪里在下雨，但雷达显示的云雨数据其实只能体现高空的雨量及湿度状况，而地表实际接受到的降水量及湿度变化情况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在2017年，这家公司基于“机器学习”开发了一个新的估计模型。这个模型可以结合有限的地表传感器数据和雷达数据，即时估计出地图每个点上地表的实际降水和湿度，且准确率较传统技术提高了超过45%。这些即时的地表降水信息无疑将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科学不仅能帮助数据分析师更好地还原关键数据本身，更能为准确预测未来的关键数据起到重要作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传统的天气预测基于大气物理模型，这类模型通常会因气象扰动而造成预测准确性的下降，而基于“机器学习”的技术方法则有望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一旦技术成熟，短期天气预测的准确率增加，农业领域防灾减灾的效率将大大提高。此外，长期气候预测能力的提升也能对农业生产区域规划的动态优化调整产生帮助。

目前，“机器学习”在气象数据整合和预测方面的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大力度推动与气象大数据分析有关的工作。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设置激励机制，鼓励院校、科研院所及科技企业开展更多气象大数据分析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气象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我国各类气象数据开源分享的力度，为加快推动气象大数据研究工作创造条件。

联系“精准扶贫”，开展“气象普查”，发展“精准农业”

现代气象为农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上天下地”的过程。“上天”体现在对气象本身的认识上，而“下地”则体现在为利用气象资源所做的地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地面配套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如美国气象公司的例子中，为校准还原地表降水、湿度信息而建设的地面数据收集系统。其二，是在气象及作物农学信息指导下，用来实现资源要素供给动态优化的设施设备，这当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可以动态调节的灌溉系统。

这两类地面配套建设本身都具有很强的公共品属性。不论是地面数据收集系统，还是农作优化辅助设施，建成之后，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每个小农户都会因此受益，然而每个小农户自身又不具备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投入它们的建设。也正因为此，这两类地面配套建设需要由政府来推动，并且在很多地区可以很好地与当前“精准扶贫”的工作结合起来。“精准扶贫”强调根据扶贫对象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帮扶方案。利用扶贫对象当地的气象资源特点，通过地面配套设施建设，使农户在生产环节逐步向“精准农业”的生产方式转变，理应成为现代气象为农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

在具体的实施层面，可以考虑以气象部门为主导，从开展“气象普查”入手。不同于基于卫星数据所开展的大区域尺度高空气象数据分析，气象普查强调收集小区域、局部环境内的地表气象信息。这个普查过程本身就会涉及到地面数据收集系统的建设。在基础设施建成、“高空-地面”数据融合之后，用于指导农业生产的气象数据基线便得以形成。在此基础上，长期获取、更新和维护精细化新数据的边际成本便会大大降低。以此为参照，利用气象资源特点为当地发展“精准农业”进行动态化的方案定制也将成为可能。

本文首发自 IESR 智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2019年1月18日文章

媒体聚焦

经济日报、南方日报等权威媒体报道
我院广东千村调查报告

作者 /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陈祎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院长、

特聘教授 方汉明

1月10日,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布了《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 诸多研究发现获得了多家权威媒体关注。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发布

1月10日,《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发布会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报告从精准扶贫、乡村治理、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系统收集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并提出专业建议。

研究报告发现,广东省农村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为59%,最主要的受雇劳动占52%;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42.5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数量接近467万;农村金融很不发达,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情况都很低,主要的借贷集中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具有互助性质的、无利息的、口头约定的、没有具体还款日期的互助性质的借贷;扶贫工程集中在产业扶贫、光伏扶贫和“一村一品”三大类成果。

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看来,新时代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不断变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人口流出加剧,互联网也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冲击,新时期需要开展系统的农村调查以摸清当前农村问题的基本情况和变迁态势。

“并且,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农业自然、历史环境差异巨大,发展水平也相差甚远,各地农村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各具差异,各类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除了全国范围的农村调查,针对广东本地区农村的深入调查也十分必要。”冯帅章说。

记者了解到,报告课题组从行政村、自然村、农户三个层面开展数据收集,抽取了广东省约100个行政村、200个自然村,包含3000多户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调查内容涉及村户的土地、收入、消费、就业、教育、农业生产、农村信贷、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扶贫战略、乡村治理等方面。

当前,广东省农村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新时期。统计数据显示,广东乡村人口338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30.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广东正积极开展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业态创新,加强标准化生产提升广东农业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梳理重大政策性问题,加大金融支农创新力度。

(经济日报 记者: 张建军 见习编辑: 覃皓珺)



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经济日报跟进报道: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报告显示:农村金融“欠发达”现象严重刊登“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报告”初步发现

《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日前发布。报告从精准扶贫、乡村治理、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系统收集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并提出专业建议。

研究报告发现,广东省农村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为59%;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42.5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量接近467万;农村金融很不发达,主要的借贷集中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具有互助性质的、无利息的、口头约定的、没有具体还款日期的借贷上;扶贫工程集中在产业扶贫、光伏扶贫和“一村一品”3大类。

据介绍,报告课题组从行政村、自然村、农户3个层面开展数据收集,抽取了广东省约100个行政村、200个自然村,包含3000多户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调查内容涉及村户的土地、收入、消费、就业、教育、农业生产、农村信贷等多个方面。

当前,广东省农村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新时期。统计数据显示,广东有乡村人口338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30.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全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广东正积极开展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业态创新,加强标准化生产提升广东农业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梳理重大政策性问题,加大金融支农创新力度。



南方+

南方日报:

自然村手机4G网络覆盖率达91%!
粤千村调查研究报告发布

1月10日,《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简称《报告》)发布会暨村长圆桌论坛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发布了村庄概况与生态环境、乡村就业与收支、乡村治理、精准扶贫与一村一品、乡村教育、农村金融6个方面的研究报告和发现,并为获得“广东千村调查先进单位”的村委颁奖。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介绍,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是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与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全省性调查项目。该项目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村入户调研,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项目利用大学生志愿者暑期返乡的契机,深入广东省乡村进行入村调查。2018年,该项目招募153名调查员,使用分层抽样法抽取广东省100个行政村,207个自然村,对2977户农村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通过GPS定位、照片核查、实地核查、电话核查、录音核查等严密的质控方式,为项目数据的科学性、严谨性提供保障。

《报告》显示,调查的100个行政村中,拥有公共交通服务的行政村的比例达63%。行政村宽带网络和手机4G网络的覆盖率非常高,100个行政村中只有2个还未覆盖宽带网络和手机4G网络。98%的行政村拥有医院(卫生所),51%的行政村拥有自己的公园或村庄附近有公园(公共休憩场所),行政村公共卫生厕所的覆盖率为55%。



4G覆盖示意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在调查的 207 个自然村中,拥有公共交通服务的比例为 15%。大约 32% 的村庄拥有医院(卫生站),34% 的自然村庄拥有公园(公共休憩和健身场所)。与行政村的情况相似,自然村的宽带网络和手机 4G 网络的覆盖率也比较高,分别为 88% 和 91% 左右。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钱文荣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理解农户的行为是探索“三农”问题的关键,广东千村调查对乡村振兴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刘守英表示,广东作为发达地区,不同的区域处在不同的发展水平,调查所得数据的应用不仅对广东的决策有意义,对全国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来自广州、清远、云浮的 6 位村委会代表也参与了圆桌论坛,专家学者、基层代表共议乡村振兴之道。

【记者】马立敏

【通讯员】武茜

羊城晚报

羊城晚报:

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显示:广东留守儿童比例高于全国

你知道吗?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 45.41%,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月10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正式发布《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介绍,千村调查从 2018 年 5 月-9 月间进行,涵盖广东省约 100 个行政村、200 个自然村,包含 3000 多户农户,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公厕覆盖率平均不过半

广东省乡村人口 3388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重的 30.8%。调查发现,100 个行政村中只有 2 个目前为止还未覆盖宽带;自然村的宽带网络和 4G 网络的覆盖率达到 88% 和 91%。

但受访行政村中,公共卫生厕所的覆盖率为 55%,自然村拥有公共卫生厕所的比例还不到 30%。

食品医疗教育支出占大头

调查数据显示,全省农村家庭年人均消费为 9185 元,消费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

消费占大头的是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消费。其中,人均食品消费就达到 4422 元,人均教育、医疗保健消费均超过 1000 元,人均衣着消费仅 354 元。

农村初中毛入学率偏低

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 45.41%,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还显示,广东 90% 的行政村有小学,但只有 12% 的村有初中,农村初中毛入学率稍低于全国的情况,在学率只有 95%。

因此,报告建议: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尤其是初中教育的控辍保学以及促进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通讯员武茜



南方都市报:

广东千村调查报告显示: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月10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布了《广东千村调查 2018 年研究报告》。该报告从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脱贫、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报告显示,广东农村小学入学率高达 99.5%,但初中毛入学率只有 95%,稍低于全国水平。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 42.5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农村初中毛入学率稍低于全国

据暨大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介绍,该调查从 2018 年 5 月-9 月间进行,涵盖广东省约 100 个行政村、200 个自然村,包含 3000 多户农户。调查内容包括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脱贫、农村金融改革等。

在发布仪式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钱文荣作为点评专家,来自广州、清远、佛山、云浮的 6 位村委会代表也受邀共同参与讨论。

报告指出,广东农村的义务教育参与和完成的情况稍好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从小学的入学率来看,广东农村高达 99.5%,小学入学情况和在学情况都比较良好。广东农村初中毛入学率稍低于全国的情况,在学率只有

95%。广东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为 42.56%,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0% 的行政村有小学,只有 12% 的村有初中。报告建议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尤其是初中教育的控辍保学以及促进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

山区“一村一品”未形成规模效应

此次的调查报告也对广东“一村一品”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广东省大约 24.82% 的行政村有“一村一品”政策,52.90% 的行政村有特色产品。其中,山区有“一村一品”的比例远高于珠三角和西翼地区。但是有“一村一品”产品的比例不如东翼。

调查显示,广东省行政村特色产品年销售收入为 255.08 万元,种植该农产品的土地占全村土地面积平均为 28.69%,种植农户占全村总户的比例平均为 43.44%。分地区来看,东翼地区的年销售收入最高,西翼地区种植面积比例和种植农户比例都最高。

报告指出,珠三角、东翼和西翼地区单个行政村的特色产品平均年销售收入都达到 300 万以上,但是山区只有 42 万左右,差距显著。尽管山区地区表示有一村一品和特色产品的行政村比例比其他地区都高,但是村民的种植面积占比以及种植农户占比都很低,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特色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是村民集市销售,其次是专业公司订购和私人收购,通过网上销售和合作社销售的比例最低。

基层行政组织和宗族组织对乡村治理至关重要

报告指出,乡村治理中,自制是核心,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基层行政组织和宗族组织的两个自治主体,对乡村治理绩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村委会人员以正式工作人员为主,临时工作人员、大学生村官和社工为辅。祠堂是宗族的代表,祠堂文化是“族人自治”的乡村治理传统特性。老人会是分乡聚居某一地方的农户自发组成的一种民间丧葬组织,它体现了村民之间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姓氏是标示一个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在较小范围内,相同的姓氏极有可能拥有相同的祖先、具有亲缘关系。

报告称，总的来说，在做重大集体决策时，受访村主要是通过民主投票、村干部投票和上级政府决定的方式做出决定，老人会等宗族组织影响有限。具体而言，有约37%的重大集体决策是由上级政府决策，有约68%的重大集体决策由村民大会投票作出，还有约27%的重大集体决策由村干部投票作出。老人会在作重大集体决策时的影响有限，只有约5%的由老人会决定。

在重大集体决策方式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从调查结果来看，珠三角地区上级政府决定的方式几率较大，村民大会和村干部投票次之，老人会在其中没有起作用。东翼地区和西翼地区村民大会的决策方式占主导，其次是上级政府决定和村干部投票，老人会略有影响。山区也是村民大会投票方式占主导，村里老人会等宗族机构没有产生影响。

采写：南都记者吴璇 陈燕 通讯员武茜

编辑：周子龙

调查发现，广东农村家庭16岁及以上人口就业率为59%，就业人员中52%为受雇劳动者，20%为农业劳动者。受雇劳动者中有41%为全年外出务工者。分地区看，西翼和山区就业人员全年外出务工的比例更高，珠三角和东翼就业人员全年本地务工的比例更高。全省全年外出务工人员中有82%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珠三角、东翼、西翼、山区外出务工人员在珠三角工作的比例分别为93%、76%、73%和91%。

全省平均外出务工年收入为35520元，省外务工的平均收入最高，年收入52750元。在珠三角务工的平均收入次之，而在粤东西北地区务工的平均收入最低。男性、高教育程度、从事高等服务业的务工人员平均收入更高。在非全年外出务工人员中，西翼和山区就业人员投入更多时间从事农业劳动，低教育程度和年龄较大的就业人员投入更多时间从事农业劳动。

记者：全媒体记者叶卡斯

广州日报： 广东千村调查研究报告发布

广东乡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到哪里工作收入最高？农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昨天发布广东千村调查2018年研究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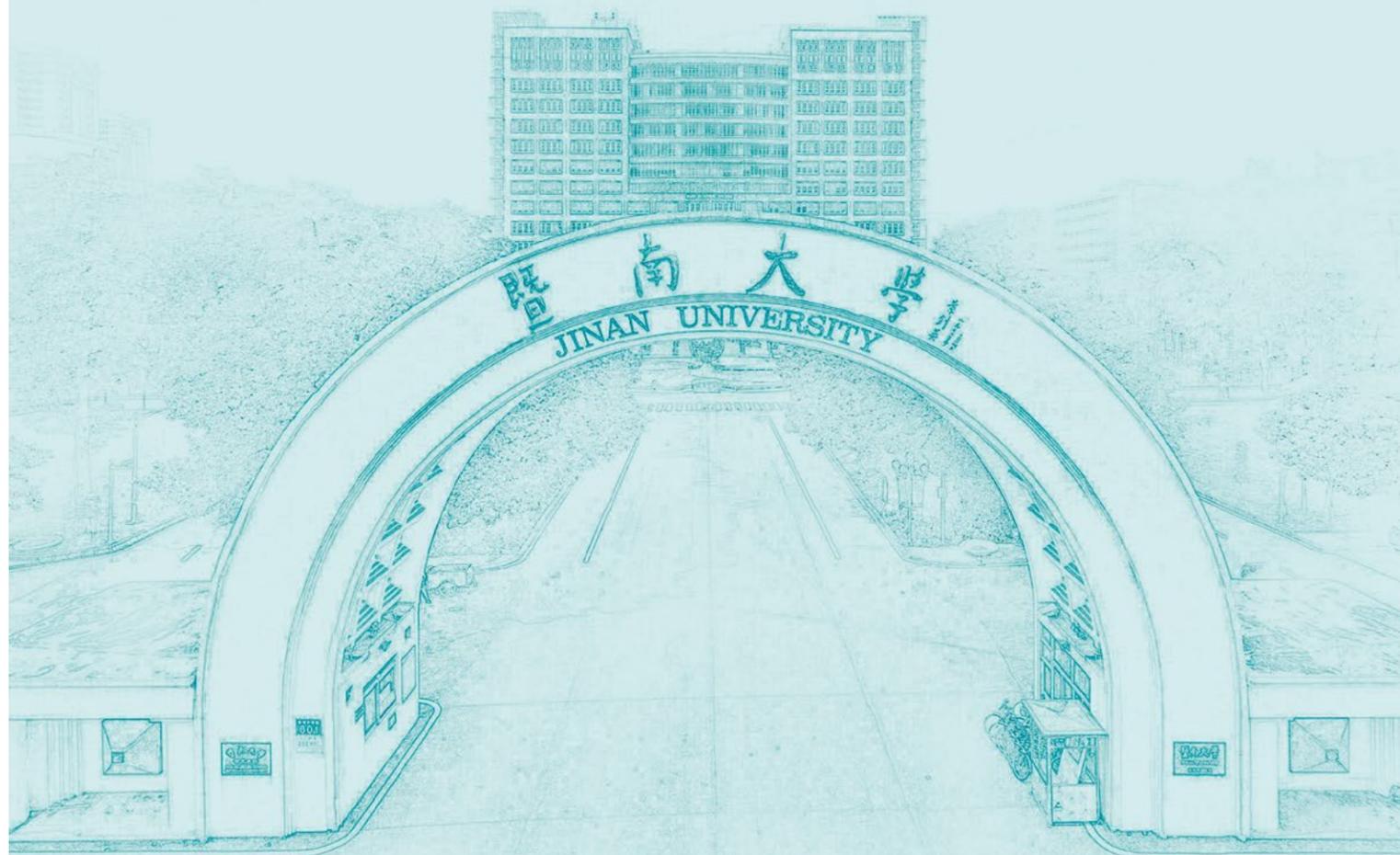


外出务工者（图片来源于网络）



数据调查

2019GMS：石牌印象：独特的市井天地



数据调查

2019GMS: 石牌印象: 独特的市井天地

摘要:2019年3月,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广东人口流动现状调查项目组为了了解当前流动人口工作与生活现状以及城市整合程度,深入走访广东典型城中村——石牌村,并进行详细严谨的绘制地图与核查工作。本文为宣传组跟访后所撰,主要描述跟访人员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铭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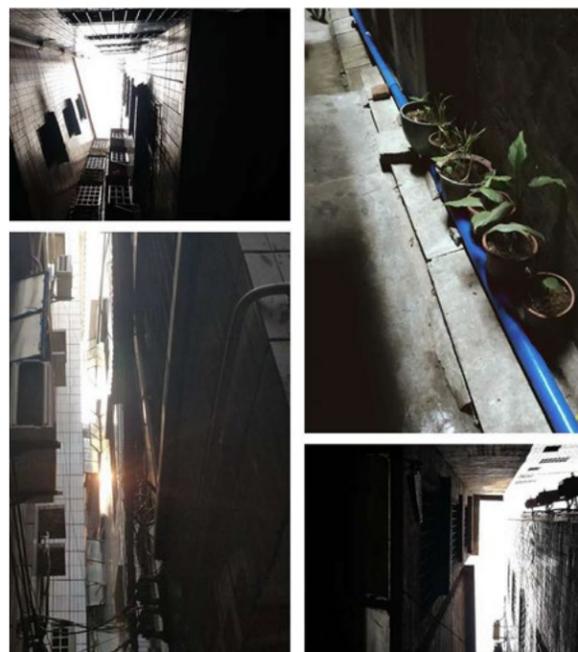
广州的石牌村是广州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城中村,坐落于繁华的天河市中心。很多在城市里生活长大的人很难想象到,在繁华的广州CBD还隐藏着另一番独特的市井天地,简单概括一下:浪掷¹而拥挤,矛盾而合理,本土而包容。

浪掷¹而拥挤

石牌村的居民早期是在竞争心态和从众心态的驱使下,为了在房屋租赁经济中有更大的竞争力或者为了后续生活发展的更高可持续性,掀起了加建房屋的风潮。那时候的居民大多没有借鉴或学习专业的建筑设计经验,或者只能遵循利己的利益观,随心所欲,于是所加盖起来的房子或者楼层总是想要努力撑到最大,却没有怎么考虑优化利用,因此在岁月流逝之间,城中村的地形逐渐衍变得极其复杂,道路狭窄布局不甚合理拥挤而富有压迫感每个人所追求的“最好”相互扩展挤压不知不觉中似乎是在亲手铸造困兽斗的囚笼。

进入石牌村,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气温比村外凉爽很多,再抬头看看天空,便会找到答案。楼与楼之间挨得太近,天空便被楼房框出了越来越小的形状,最后只剩下小小的一个方块或者细小狭长的一线,广阔蔚蓝的天空和温暖明媚的阳光在这里是稀罕物,似乎独独高层尽得。因此即使在炎热的夏季,走在村里的街道上,也像进入了“空调房”,体表可感更为阴凉湿润。

¹ 浪掷,意为随便抛弃,随意花费。



石牌村内的光

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样的城中村开展绘图工作是多么地困难,项目组的成员最初只能通过自己的双脚行走确认大致房屋群体,网上的地图根本不能细化到每一条巷子,因此想要认清每一条小路,准确找到受访者的位置,都必须靠自己。

渐渐深入石牌村,发现所走的路逐渐变小变窄,有些巷道仅能一人通过,而转过一角,可能是一片不算宽敞的空地。走的路多了,便会发现在石牌村有很多这样的碎片空地没有被有效利用,大多是用来停放着电动车和单车,或堆放着某位居民整理好的可回收废品和各种杂物。

至于街道的卫生状况,难以逃脱被人所诟病。由于街道分布的不合理性以及过于密集的人口密度,导致科学规整的污水排放系统的修建难以推进,街道硬件设施的管理养护难以正常实施。

矛盾而合理

虽然地处广州的黄金地段,但也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钉子户”,石牌村 完备,能做饭能洗衣,绝大部分楼房都有门禁,管理很严格。因而,在这里的租客多半是外来务工人员,节俭也好,屈就也罢,反正很多人选择租住在石牌村。

从这点来看,石牌村也是给初到广州打拼而本钱有限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栖身之所。

本土而包容

石牌村作为一个毗邻繁华天河商圈的村落,一进去就可感受到浓厚的老广气氛,树下常见石桌前乘凉打牌的三五老人,欢声笑语皆是抑扬顿挫的白话方言。

石牌村内的报箱

相比村外行人匆匆、有序而仓促的天河商圈,石牌村的时间缓缓流动,这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气极为生动。

之前提到,在这里的租客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合租在一起的情侣走过,普通话里携裹着方音的余味;也有北方模样的汉子提着一堆生鲜站在居民楼口,看样子是要回家做饭;小卖部老板的脸被高耸的棒棒糖盒子挡住,却能够清楚地听到他和同伴互相调笑的潮汕话。



傍晚时分,我们的项目组依旧在仔细记录并反复核对每一幢楼房的相对位置。沿路走到较为空旷的地方,老人牵着幼儿园刚放学的小朋友从我们身边走过,而下班的人们也渐渐聚拢于此,本就喧闹的石牌村,此刻更是摩肩擦踵,到了夜间,此处又会归于平静,梦乡里承载着每个异乡人对明天的期盼。

城中村是一个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聚合体,复杂而难以分割,处处矛盾却处处给人与外来文化以容身之地。不管这里多么地复杂,我们项目组都会一步一个脚印,渐渐深入,在绘图纸上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出这一个城中之村,滞后却不会被遗忘。



项目组在调查

人物专访

IESR专访

IESR 专访

副院长张思思专访—— IESR 最初吸引我的 是初创团队成员的成就感

【人物名片】张思思，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2009年获美国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曾先后在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Demograph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the B.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Housing Policy Debate* 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十余篇高质量文章。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项目、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智库课题及北大-林肯中心研究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获得2017年世界华人不动产学会年会最佳论文奖一等奖、2016年上海金融业改革发展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成为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的三年里，张思思见证了学院发展的整个历程，从最开始的创立到今天在学科发展、国际化教育、机制改革、新型智库全方面取得累累硕果。

IESR最初吸引我的是 初创团队成员的成就感

早在 IESR 筹备成立时，张思思就被当时还是上海财经大学同事的冯帅章老师描述的研究院发展愿景所吸引。冯帅章认为广东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客观上为人才发展、

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大环境，他想抓住这个机遇做数据库的建设。数据库是学术界的一个基础设施，建成后推动很多相关研究的发展。基于在坚实的数据基础上开展的严谨的学术研究，结合现实问题为政府建言献策，能真正推动学术成果为社会带来一些改变。

张思思选择了 IESR，她想参与经历一个学院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想试试在中国建立新型智库。“这就像是创业，建立全新的平台尝试全新的事物。即使未来要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作为初创团队成员的兴奋感和成就感吸引着我。”她信任冯帅章院长的能力和判断，相信他能带领

大家把愿景变成现实。

张思思有5年海外工作经验。2009年，她从美国波士顿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后，选择在美国的智库工作。她去的第一家智库是IMPAQ International，该智库在过去十年迅速壮大，目前已在全球各地发展了十几家分支机构。随后，在2010年3月，美国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邀请她加入，在这里工作的三年半时间，她对住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重心从读博士的劳动经济学转向城市和房地产经济学。2013年10月她加入房利美(Fannie Mae)。“五年的海外工作经历对我非常宝贵，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美国一流智库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工作模式”张思思说。



2016年张思思（右二）访问美国智库IMPAQ International

她始终认为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严谨的政策研究可以转化成学术论文，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学术成果经过适当改写可以产生政策成果。“国内有不少观点认为年轻老师应该发论文而不应该做政策研究，但我觉得这两者是不冲突的。我的前两份工作是全职的研究员，也没有因此让学术研究停滞不前”。张思思在美国智库工作期间，与同事合作撰写的政策报告在业余时间改写成论文，发表在Demograph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ER Papers and Proceedings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张思思说“我在做每一个政府项目和写政策报告时都会思考如何将这个项目转化成学术论文，现有文献有什么局限性，用什么样的identification，也会向学术界资深的教授请教。”

在张思思的眼里，“IESR就像一个小baby，我看着他出生，长大，并和他一起成长。当时完全没想到能够发展得这么快，也没有想到一个全部由年轻人组成的以海归为主的学院可以把智库工作做起来”。美国的智库模式是以数据为基础，用最前沿的方法，做严谨的实证分析，给政府提

供咨询，并将成果通过各种途径传播给大众。在冯院长的支持和指导下，她把国外的这套先进的制度包括运作流程、管理模式、成果转化等经验应用在IESR智库建设上。



张思思（左二）出席广州2018营商环境研究联盟成立仪式

如今，研究院已经成立了社会调查中心与政策研究中心，两个中心紧密配合，践行“新型智库”发展模式。智库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发展与住房政策、产业政策、乡村振兴、劳动就业、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人口流动等领域。基于社会调查中心的微观数据形成政策性报告解读，立足本土，放眼国际。短短三年间，智库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学院老师撰写的观点评论文章多次在国内知名媒体财新传媒、财经、南方周末、澎湃新闻等发表，政策研究得到广东省省委领导批示。在2017年首次荣登核心智库榜单，成为全国16家“高校智库A类——211高校经济领域”的入选智库之一。此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中，政策中心名列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中第十位。

发展智库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尝试



我院一行赴京进行智库交流访问（左4为张思思）

面对这些成就，张思思并没有觉得未来轻松，她认为目前在国内发展以年轻人为主、以海归为主的智库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尝试。其中，最大的阻力来源于吸引和激励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加入智库的工作。首先，国内就业市场上，

愿意成为全职智库研究员的科研人员很少，可能是因为平均待遇及职位的稳定性不如教学科研轨的老师。学院的政策研究轨只是一部分时间做政策性项目，大部分时间自主写学术论文，而且还有教学减免，即使这样也很难吸引到新的有竞争力的人才。其次，学术研究和政策成果的转换还存在一些冲突。青年学者的研究领域一般较集中而且论文研究的时间周期较长，但是做政策讲究时效性，而且很多时候热点问题未必和学术领域完全一致。在访问上海及北京多家智库的过程中，负责人也纷纷谈到现有激励机制不足以鼓励学者做政策研究。

为了解决智库面临的人的问题，IESR做了诸多尝试。首先是柔性引进资深学者参与项目。引进政策研究经验丰富的特聘兼职研究员，以这些研究员的研究领域为中心开展项目，组建团队。项目推进过程中邀请该领域的顶尖学者和资深专家对项目进行指导。在今年的广东省千村调查项目中，自2018年5月份项目启动到2019年1月份项目报告发布期间，邀请了多位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共开展了3次研讨会，指导千村调查及报告的撰写。张思思表示目前正在招募硕士学历的全职研究员加入到IESR政策研究中心的团队中。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结构丰富，硕士学历的也占相当比重。本科生作为研究助理在智库工作几年后申请一流学校的博士也很多见。在美国的工作经历中，她发现硕士生和本科生在某些方面，比如人际沟通、项目执行、写作等方面的能力一点也不输于博士生。她认为IESR也需要全方面地吸收具备不同能力的多元化人才。



张思思在2018千村调查报告内部研讨会上发言

其次，鼓励学院老师将学术成果转化政策成果并尽可能提供支持。比如将学院老师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经济实证文章由全职研究助理转化成专题报告，设立“黄埔大道西观点”公众号给老师提供发声的平台，并将优质文章推送给公开媒体。给学院愿意参与政策研究的老师提供激励如项目酬金、减课时、延长tenure clock等，吸引

他们作为兼职研究员加入到项目中。

此外，IESR还决定建立共享数据平台。张思思介绍道，“IESR愿意开放数据平台，吸引外界感兴趣、有潜力的学者加入到我们的项目中来。”首个开放的数据是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数据，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可以提出申请。申请通过的学者将可以在远程数据平台上免费使用2018年广东千村调查数据进行学术研究，并可以针对2019广东千村调查提交具体研究计划及参与研究设计。与此同时，学院正在开展“调研南粤，美在乡村”大学生调研大赛，对入选的调研方案提供前期指导、调研补贴并将对调研成果评奖并举办成果展示交流会。

享受工作，找到平衡点

作为IESR的副院长和智库负责人，张思思日常面临着许多行政琐事。她尽量在繁琐而忙碌的工作及家庭中找到平衡，见缝插针地开展学术研究。“虽然行政工作占用了很多时间，但也让我更珍惜剩余的时间，工作得更有效率。”忙碌的工作，也让她学会更好地面对压力。“我在行政工作及智库管理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每年去北美经济学会招聘海外博士，能了解刚毕业的博士生做的前沿研究。负责组织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和政策性会议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各领域的资深学者。做智库也是我回国一直想尝试的事情。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张思思生活照

最近，张思思还被评上了IESR的长聘副教授。研究院实行教师聘用双轨制，即教学科研轨与政策研究轨并行。教学科研轨含助理教授、副教授、长聘副教授、正教授四个职级。每年，符合条件的教师可提出升职申请，按照研究院的规定程序和标准进行评审。张思思表示，学院的tenure制度正向海外知名高校看齐，没有期刊目录的硬性要求，更看重同领域专家的评审意见，要感谢校领导对学院的支持及给予学院充分的自主权，灵活的用人制度和评聘标准能吸引到更优秀的人才。

学生天地

人才培养要闻

人才培养要闻



下一站，IESR！ ——寒假冬宣招生纪实

在高三这个人生的岔路口和迷茫期，有曾经的学姐作为“过来人”对学校报考、专业选择指点迷津，从亲身经验出发提供真实、有用的信息和建议，着实能让埋头苦学的高考生们提振信心，豁然开朗，更加明确前方的道路。

“走，回母校去！”

“很希望把自己的收获跟学弟学妹们分享！”

“为亲爱的师弟师妹们强烈‘安利’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

2019年寒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一批学生志愿者们带着沉甸甸的资料，和满腔为师弟师妹们答疑解惑的热情，踏上了回家的归途，他们此次回家的重要“任务”就是回到高中母校为师弟师妹们介绍 IESR。

IESR 大三学生李蔚也是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干将，作为当初经历了转专业的“曲折”历程来到 IESR 的学生，可谓最有发言权。在 IESR 就读期间，他参与了学院组织的多项社会调查，在现实中感受社会脉搏，学到了最前沿、最联系实际的知识。此次回母校招生宣传，他也感触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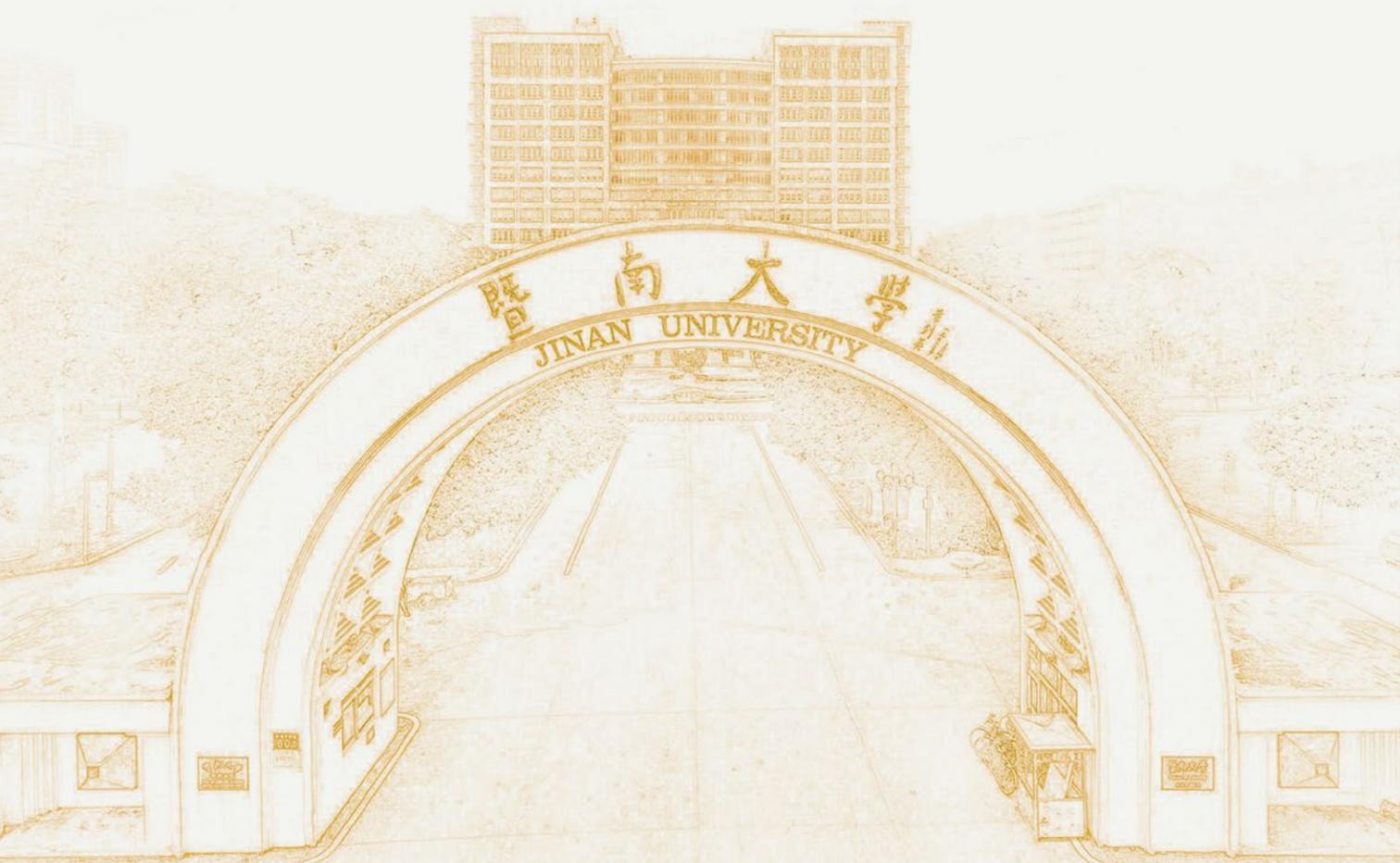
“很希望把自己的收获跟学弟学妹们分享！”2018年寒假，IESR 学生踏上了回母校宣传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之路。



IESR招生宣传册

回到母校，清一色校服映入眼帘，教辅堆积如山，黑板上写满公式……相比大学生活，高三这一幕幕场景，既熟悉又陌生。

“大学生活是怎么样的呀？”这是被问得最多、也最满含期待的问题。虽然在高三，大部分学习都基于课本，想起自己的经历，我们感慨良多。IESR 会有更多探索性的学习。去年，IESR 学子参与了学院组织的多项社会调查（如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千村调查等等），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社会脉搏。有时，课本上的知识已经不够，需要自己在前沿论文中学习。知识不再只从书本上获得。





在李蔚的母校潮州金山中学招生咨询会现场

很多学弟学妹问，经济学专业将来能做什么工作呢？从用双脚丈量中国，到用经济模型描述世界，学院的专业培养让我们掌握分析社会问题的利器，对于“什么是经济学”我们也有了更深的体会。通过经济学训练，我们运用批判性思维和研究工具，厘清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一项政策是否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福利？这都有待于经济学家的解答。

很多学弟学妹还是很关心就业，懵懵懂懂，我们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大学是一个熔炉，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特别是 IESR 很多厉害的老师。从国外学成归来，他们开阔的视野也影响了学生。学院更有 seminar 和 workshop，聆听学者们的争鸣，我们也渐渐明白，除了就业，人生还有很多可以为之追求的方向。

“学长，我要努力考去你们学校！”我们很开心，大概在他们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距离高考不远啦，希望各位高三学子们加油！IESR 在下一站等着你们！

IESR 开展 2018-2019 学年 第三、四期朋辈分享会



IESR 与国际密切接轨，为学子们提供了丰富的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今后 IESR 也会继续开展此类活动，支持和鼓励同学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图为朋辈分享会的大一大二听众们）

在享誉国际名声的百年侨校暨大里，在与国际教育密切接轨的 IESR 里，参加交换项目是学子们常走的一条路。然而，许多缺乏经验的同学仍对此感到一头雾水。为此，IESR 在 2019 年 3 月 14 日、3 月 21 日特别举办了第三和第四期朋辈分享会，邀请了参加过交换项目的同学，为学弟学妹们传授经验。

在第三期分享会中，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交换了一学期的李欣桐同学，分享了她的经验：

首先，出国交换前，要在成绩和外语上提前准备。要注重大学时期英语成绩，提前参加雅思托福的考试；注重交换前的绩点排名以及综测排名；注意所修课程的学分转换并且考虑未来规划。

其次，要了解自己是否适合交换以及选取合适交换的学校。最好参考前几年的交换生大概情况，了解学长学姐们的去向。



李欣桐分享交换经验

武乘羽同学则是参与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交换项目。她给同学们分享的经验是：要根据自身未来目标来确定合适自己的交换项目，并且进行有效规划。另外，要注意交换项目的步骤流程与注意事项，出发前做好准备。



武乘羽分享交换经验

在第四期分享会中，IESR 则是邀请了张子晗和吴乃嘉两位同学。

张子晗同学参与了台湾东吴大学的交换项目。除了介绍去台湾进行交换的前期准备工作，她还为学弟学妹们讲述了交换生的生活。她不仅在这段交换生活中收获了许多感动与快乐，在学习与实践上也取得了突破，例如去台湾合晶科技公司进行调研活动等等。



张子晗分享交换经验

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进行交换的吴乃嘉同学也分享了她在美国时的故事。她详细介绍了出国前准备托福、申请学校及面签时的一些注意事项，还为同学们展示了在交换期间选择的经济学课程。另外，吴乃嘉同学也分享了对于出国交换的心得：外出交换不仅可以开阔视野，更能为个人能力提供强有力的证明，使 CPA 更具认可度，为以后进一步出国深造打下基础。



吴乃嘉分享交换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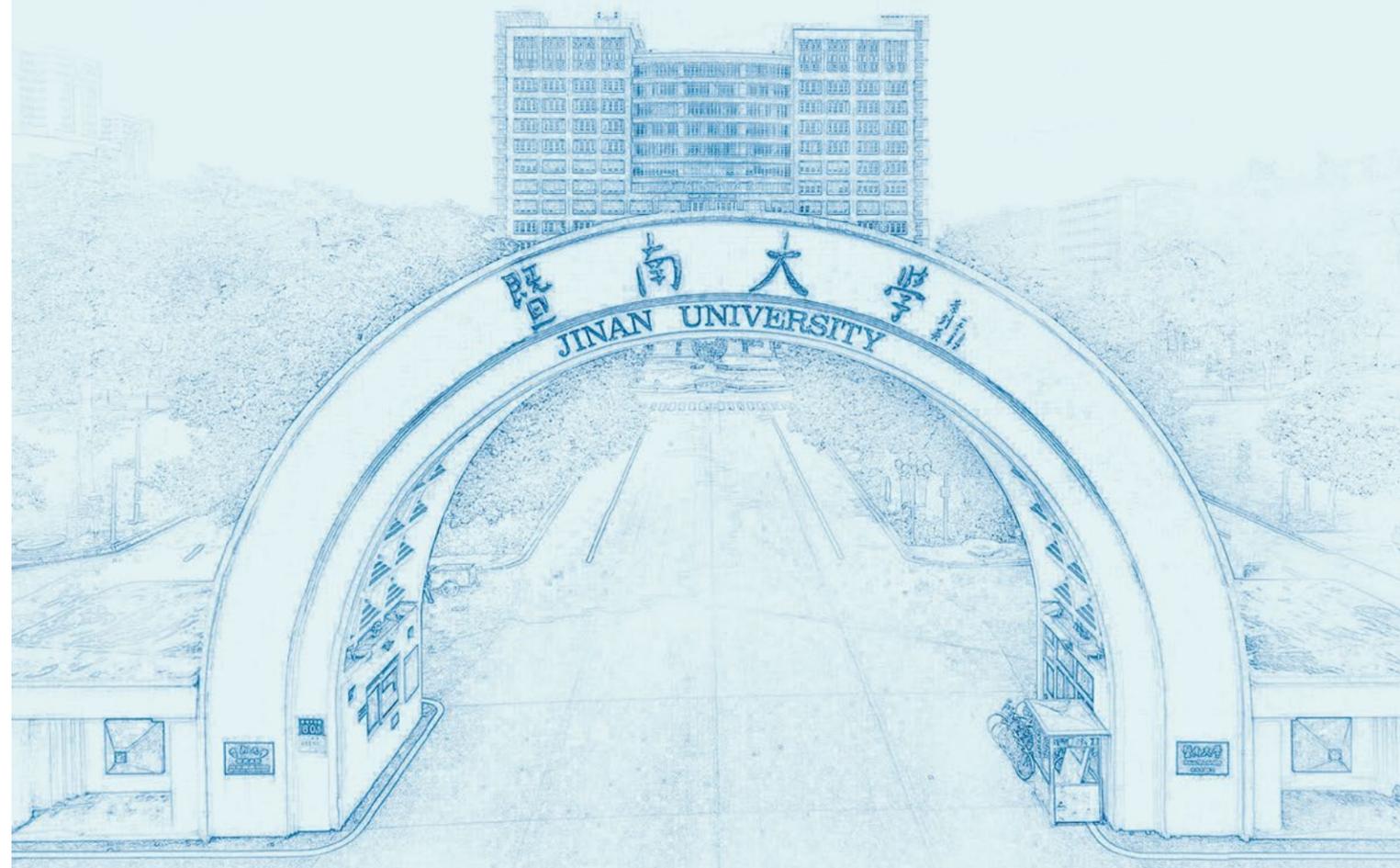
对外交流

我院院长冯帅章一行访问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

斯坦福大学李宏彬教授来访我院

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来访我院

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
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高层论坛



我院院长冯帅章一行访问 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



我院院长冯帅章一行访问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

当地时间1月3日，我院院长冯帅章、副院长张思思受邀访问了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该分行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埃默里大学讲席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查涛，乔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资深研究员姚文雄及美联储费城分行资深金融经济学家安旭东与我院一行展开了深入交流。冯院长介绍了我院的基本情况，以及我院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师资力量及未来发展计划。查涛表示非常看好我院的发展前景并期待未来双方的深度合作。



冯帅章院长、张思思副院长与美联储亚特兰大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查涛

斯坦福大学李宏彬教授来访我院



分享会现场

2019年2月21日，斯坦福大学李宏彬教授来访我院，受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邀请与我院教师进行职业经验分享。

李宏彬教授首先与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进行交谈，冯帅章院长向李宏彬教授介绍了我院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科研智库、社会调查项目、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等方面的举措与成果。李宏彬教授表示去年前来我院参加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研讨会时就对我院的发展速度、师资质量、研究问题以及社会调查项目印象深刻。他对我院创新改革的发展模式表示认可，希望我院能够继续坚持国际化发展模式。

之后，李宏彬教授与我院教师分享了他的职业经历。他表示年轻教师如何选择第一份工作，高水平的研究环境是最重要的，不要太在意第一份工作能否拿到终身教职，而要专注于不断提升自我的市场价值。在论文写作方面，

研究有价值的问题与严密的论证都很重要，但研究有价值的“真问题”，“好问题”是第一重要的。在学术起步阶段，要积极与别人合作，尤其是与资深的学者合作，不断提升自我的核心竞争力。从事学术工作，“推销”也非常重要，要明确你的受众是谁，让他们容易理解的方式和语言来“包装”自己的研究成果。



李宏彬教授

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来访我院

2019年3月11日，我院特聘教授、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来访，并受邀为我院学子分享了他的海外留学经验及科研经历。

座谈会伊始，徐熠教授指出，同学们需要对自己的未来有大致规划：是否有强烈的欲望一定要在海外接受进一步的学习？还是选择在国内完成进一步的深造？未来是希望进入学界，还是更希望进入业界？他认为，不同的职业规划会导致不同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要基于个人的自身情况。

接下来，基于我院的基本情况，徐熠教授着重向同学们介绍了海外博士项目。首先，徐熠教授介绍了海外顶级学府的招生要求，并对同学的申请过程提出宝贵建议。托福和 GRE 成绩达标是最基本要求，而在这第一关过后便是个人绩点、科研经历和推荐信。他特别强调了个人陈述的重要性并且建议同学们按真实情况填写，切忌模板化地照搬照抄。



徐熠教授



分享会现场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杨慧研究员来访我院

2019年3月19日上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杨慧研究员为我院教师分享了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及相关的研究介绍。

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自1990年开始，每十年开展一次，2020年即将开展第四次全国调查。作为一项全国性调查，该调查覆盖31个省区市约30000样本量，调查内容涉及教育、经济、婚姻、健康等九大领域，全面记录了近四十年来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杨慧为与会人员详细介绍了该调查的内容、质量控制、当前数据开放情况等，还列举了若干基于该数据库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例子，以说明数据的开发情况。

经过此次分享会，我院教师对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库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冯帅章院长表示，希望之后有机会能在调查执行、学术研究领域开展一系列合作。



杨慧研究员

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 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高层论坛



冯帅章教授

3月23日，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高层论坛。国内重点高校经济学院主要负责人、国内顶尖经济学期刊负责人共计50多位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及骨干教师代表参加了会议，就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这一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主持。

会上，冯帅章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经济学院焕发新的活力。他表示，经济学是实践和理论的结合，应当鼓励教师对中国实际问题开展广泛研究。他期待人民大学作为经济学界的领头羊，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更好地提供理论贡献和研究范本。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兼院长刘守英主持会议

2019经济学 (国际化创新班) 寒假宣讲

图 说

2019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寒假宣讲

